

“四人帮”篡改 马克思主义哲学言论摘编

(内部材料，征求意见稿)

一九七八年七月

编 印 说 明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阴谋篡党夺权。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是难得的反面教材。这本资料是为深入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提供一些批判的靶子。

资料主要选自“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代理人的反动言论和他们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个别条目选自“四人帮”影响下报刊上比较突出的反动观点。

“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惯于摘取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肆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以假乱真，制造了许多混乱。批判时要注意正本清源。

本稿是征求意见稿，编选中有不妥之处，请提出意见；有重要遗漏，请提出补充，并请注明原出处。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七月

目 录

一、唯心主义横行

- (一) 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鼓吹主观精神创造世界…… (1)
 - 1、打着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幌子，反对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吹精神万能…… (1)
 - 2、随心所欲地捏造事实，篡改规律，叫嚣要“打破”规律…… (2)
- (二) 反对实践经验，反对理性知识，贩卖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3)
 - 1、打着反经验主义的旗号，否定实践经验…… (3)
 - 2、否认理性知识的作用，鼓吹蒙昧主义…… (5)
- (三) 否认真理的客观性，鼓吹实用主义原则…… (8)
 - 1、宣扬所谓“需要的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的…… (8)
 - 2、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攻击从实际出发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 (10)
 - 3、割裂认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时而鼓吹绝对主义，时而鼓吹相对主义…… (11)

二、形而上学猖獗

- (一) 攻击对立统一规律是“形而上学”，只讲斗争不讲统一，鼓吹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对着干”…… (14)
- (二) 打着反折中主义的旗号，反对两点论，鼓吹对立面的绝对不相容…… (16)
- (三) 否认“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时而否定一切，时而肯定一切…… (19)
- (四) 割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以普遍性否认特殊性，以特殊性否认普遍性…… (21)
- (五) 否认矛盾转化的条件，鼓吹抽象的统一性…… (22)
- (六) 肆意玩弄概念的灵活性，否认事物质的规定性，大搞诡辩术…… (23)

三、唯心史观泛滥

- (一) 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 (26)
 - 1、否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大反所谓“唯生产力论”…… (26)
 - 2、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鼓吹“政治决定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28)
 - 3、鼓吹反革命的暴力论，叫嚷一切问题都要

“暴力解决”	(29)
(二) 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意志出发，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31)
1、把阶级斗争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胡说没有儒法斗争，“历史就不存在”	(31)
2、歪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科学论断，宣扬反革命的“阶级关系新变动”	(32)
(三) 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鼓吹“超人”哲学	(34)
1、丑化和鄙视劳动人民	(34)
2、美化和吹捧封建帝王	(36)
3、主观意志的自我扩张，自封为历史新纪元的创造者	(38)

一、唯心主义横行

(一) 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鼓吹主观精神创造世界

1、打着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幌子，反对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吹精神万能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1967年9月

物质决定思想意识，而人的思维决定物质。

江青1972年8月23日在广州友谊剧场的讲话

精神与思想是一个意思，如果说“精神决定一切”是错误的，那么物质决定一切就对了么？林彪这个人是在搞形而上学的，是根本不搞辩证法的。主席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

的”，没有讲其它决定一切。

张春桥1972年10月18日在上海5703厂的讲话

精神万能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

张春桥1972年在上海5703厂的讲话

无产阶级靠着精神上的胜利，走上了统治舞台，今后也只有靠着一系列精神上的新胜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宗明兰1976年7月在辽宁管理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革命大批判的作用，正在于它不断铲除资本主义旧土壤，使党内资产阶级复辟旧制度的阴谋越来越难以得逞。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紧跟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继续战斗》，
《红旗》1976年第10期

2、随心所欲地捏造事实，篡改规律，叫嚣要“打破”规律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

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

张春桥1976年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

的必然规律。

江青的一次讲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第11页

在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历史中，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常常是同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家爱国，儒家卖国，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爱国主义者王安石》，1974年8月17日《北京日报》

对价值规律我们也要利用它，符合我们的目标就利用它，是在这个前提下有条件、有限制地利用它，否则就不用。

马天水1976年6月在上海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讲话

门德列捷夫周期表，总是不能破，迷信就是要破。

姚文元1971年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的一次讲话

（二）反对实践经验，反对理性知识，贩卖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1、打着反经验主义的旗号，否定实践经验

我党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是经验主义。

江青1974年4月4日在染印法电影技术攻关会议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材料之三》或《材料之一》、《材料之二》。

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

张春桥1975年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战会上的讲话

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迟群1975年4月4日向梁效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经验主义已成为主要障碍。……老干部有什么经验，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

毛远新1975年3月21日在中央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经验。但是，是什么经验，要做阶级分析。他们的经验就是复辟倒退的经验，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对现在没有什么现实意义，还给自己贴一点金。

迟群1976年4月7日在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抬出“经验”到处吓唬人，什么这些人“有经验”，那些人“没有经验”，什么这要靠“经验”，那要靠“经验”，似乎“经验”就是一切。说什么“把主义两字去掉，经验是宝贵的，不能忽视”，这是公然为经验主义辩护。

梁效：《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北京大学学报》
1974年第2期

台阶论，就是把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框里关闭起来，使其丧失尽革命性而后再去做掌权人，替资产阶级出力，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新幼苗压在多年积重的等级台阶下死亡，让资产阶级的复辟力量在法权的浸泡中膨胀起来，让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官贵民贱的泥坑里爬来爬去，年青的爬成年老的，革命的爬成反革命的。

宗明兰1976年5月15日在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这种坐飞机、坐火箭上来的干部好得很，是对剥削阶级旧观念旧传统的一种挑战，是在培养教育干部上的一场革命。

网上

如所谓马列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要有自己钻研，要有亲自试验，才能发言。那么列宁批判马赫是不是也要有自己的亲自试验，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力学，是不是也要自己去做试验来作证明，主席和杨振宁辩论，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没有所谓基本粒子，是不是也要亲自去试验才能证明。这种论点是根本上否定自然科学方面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姚文元1976年1月6日对照《红旗》编辑部召集人的谈话

2、否认理性知识的作用，鼓吹蒙昧主义

“没有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承担”，这句话问题就更大了，简直是反攻倒算！过去老干部大多数没有文化，照样能够参加革命。

江青1973年7月28日在审查电影《园丁之歌》时的讲话

“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本身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承担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在我国人民近五十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史上，有多少从未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难道不正是他们，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又有多少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说明，这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的谬论，简直就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初澜：《为哪条教育路吱吱唱歌》，1974年3月5日《文汇报》

反正，有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天就塌不下来，都是文盲也不要紧。

张春桥1972年10月在上海市委有关组、办、驻沪三军政治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即使搞十年运动，学生都成了文盲，但打倒刘少奇、林彪就是最大的胜利。

张春桥1972年10月3日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等人的讲话

宁可少读两年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

毛远新1976年6月的一次讲话

旧大学出来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啥事不干，啃了一大堆书，这大概够得上那个“样子”，算“有高度科学知识”了吧？其实呢，死啃那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书本知识，多半为了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差不多了。要是全能忘掉倒还好一些，不忘掉的，留在脑子里，留得越多，受毒越深，就再也不想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一门心思要当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

方钢：《论教育革命的钟声响彻四方》，《红旗》1976年第2期

学生参加生产要纳入国家计划，学生三年固定在一个工程队里，新生来了重新考虑，产品、任务不固定没有关系，人固定就行。

姚文元1969年5月19日在上海同济大学的讲话

“清华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开门办学”，“学校里留的人越少越好，同济的都走光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朱永嘉1970年8月31日在听取汇报五七公社工作时的讲话

1970年张春桥说：“生物系不搞马、牛、羊，要彻底砸乱”。

1973年朱永嘉说“动物学、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可以搞畜牧兽医”，又说“生物物理搞仿生学太渺茫”，强行取消基础学科专业。同时朱永嘉规定遗传学专业只能“以农业为方向”。

复旦大学生物系教育革命组揭发

(三) 否认真理的客观性，鼓吹实用主义原则

1、宣扬所谓“需要的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的

材料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要从有什么材料出发。从材料出发，还是从斗争的需要出发，例如，我们可不可以从现实的斗争需要考
虑，应该有些什么题目，然后寻找材料，这样，材料的运用也就活
了。

迟群1974年3月16日传达江青有关批林批孔的黑指示

你们批这个干啥（注：指1969年12月16日发表的所谓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实用主义的“三十字经”，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杆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的《再版前言》是我写的，林彪不过是签个名。

张春桥1971年12月27日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活学活用”，总不能算错吧。……“急用先学，立杆见影”有时也会有的。如要写批苏修的文章，就去查列宁批沙皇的话，查来就可用上了，这不是“急用先学，立杆见影”？他（注：指林彪）的有些话有时还是对的，否则，他的话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反对？

张春桥1972年10月在上海市委有关组、办、驻沪三军政治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写文章要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引用马列主义，要引证就要去找，就得学习。

张春桥1970年5月17日在上海钢厂厂级新干部学习理论时的讲话

(1976年10月8日新华社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后)肖木说：“这一下旗帜被抢去了”。

朱永嘉说：“现在可好了，手脚被捆缚住，动不起来了”。

肖木说：“这一招可厉害呢，毛主席的批示，手稿归谁保管，谁就有了解释权了，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反正是各取所需。”

王知常1977年1月21日对上海酝酿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交代和揭发

我就是搞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

王知常1976年2、3月间对近代史编写组部分成员的讲话

写历史文章要生动，可以七真三假。《史记》中描写项羽死的情形谁见过？至于他临死讲的话更不能有人知道，司马迁写了，这是文学加工，造出来就成真的了。

王知常1975年上半年在党史组的多次讲话

你将来如果当了大总统，你平时一些出洋相的事也可以写到传记中去，成为英雄事迹。我是搞历史的，知道历史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王知常1974年、1975年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的几次谈话

财政上有个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问题，还是按理办吧！
……需要的就是合理的，合理就是合法。

毛远新1974年初在辽宁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2、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攻击从实际出发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

张春桥1975年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无非是人的两条腿，一会儿理论跑在前面，一会儿实践跑在前面，就是这样一前一后，波浪形的关系。

朱永新1975年初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的讲话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1967年9月

艺术作品中的真实，是作者处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来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的产物。因此，它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认为真实的，戴着有色眼镜的资产阶级，就可以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主义；而资产阶级认为真实的，在无产阶级看来，正好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可见真实不真实，典型不典型，深刻不深刻，在这些问题上，不同阶级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标准。

初澜：《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1974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在阶级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根本对立的文艺观，也有着根本对立的“真实观”。……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阶级爱憎出发，对同一现实生活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是迥然不同的。

《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代表性论点批判》第53页

3、割裂认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时而鼓吹绝对主义，时而鼓吹相对主义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关键在于实践，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去做。

张春桥1967年对王知常等人的讲话

样板戏是一个样板。样板就是榜样，榜样就不能走样。

姚文元1969年8月14日被见样板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时的讲话

所谓“突破样板戏的框框”，实质上就是反对把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反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反对学习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宝贵经验，也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重弹“黑八论”的老调。这些都是政治上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那股反动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革命新文艺——谈革命样板戏的历史意义和战斗作用》，1974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1975年4月，在研究围剿《海霞》影片的所谓辩论会问题上，于会咏攻击说：“六条标准是分辨香花毒草的起码标准，而‘三突出’原则是最高标准。”

刘庆棠交代

你越写得合理，越不合理。

张春桥1976年9月9日在修改《白毛女》座谈会上讲话

基本教材，除毛主席著作外，是稳不下来的。你一稳定，学校就完蛋了。

张春桥1976年5月1日在接见上海工总司委员时的讲话

毛主席提倡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是努力的方向。但学生

中没有一个是“三好”的，一个青年总是有缺点，如身体好（对一个戴眼镜的同志），你的眼睛就不行，身体真好？学习好，学习中总有缺点，好了又有缺点，坏的没有好的，这是形而上学，我看评三好不太好，还是一分为二好。

张春桥1972年12月5日在上海关于召开第六次团代会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不要追求安定的教学秩序，……如果有一天恢复到过去的教学秩序，教材编得好好的，只要稍微备课就行了，学生很听话，乖乖的，纪律很好，家长也满意，那么到了这一天，那也许是无产阶级教育灭亡的开始。

徐景贤1972年11月10日在上海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形而上学猖獗

(一) 攻击对立统一规律是“形而上学”，只讲斗争不讲统一，鼓吹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对着干”

迟群说：“对立统一律这个提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只讲统一，不包括斗争。这条（注：指林彪对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一个考妣：‘对立统一律即二合为一律’）不能算篡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转引自1978年第2期《红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

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只叫“对立统一规律”不是丢掉了斗争吗？

迟群1975年底对梁效的一次讲话

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它贯串于一切过程和每一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第180—181页

谢静宜：“……最后一点，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迟群、谢静宜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在“对着干”，不“对着干”还有什么矛盾呢？

高路：《折衷主义必须批判》，《北京大学学报》1976年第6期

我们认识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红旗》1976年第1期

形势是大好的，大好的形势是斗出来的，既然是斗出来的，是谁斗出来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出来的，是革命派同走资派斗出来的。既然是这样，就会是长期的。是这个基本形势决定的。肯定在某一历史阶段，可能会出现反复，无非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了，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是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文化大革命。但这么讲太刺激人了。如果象△△△那样安定，就复辟了。

迟群1976年10月6日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注意跟林彪斗争的经验，一级盯一级，眼睛盯着走资派，来了运动首先整领导人，最后盯到中央，一旦出了修正主义，随时揭露、批判。要抓住一个斗字。

迟群1976年6月24日对某负责人的讲话

(二) 打着反折中主义的旗号，反对两点论，鼓吹对立面的绝对不相容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技术平列起来，这实际上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

例如，在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在教育、科技工作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脱离实际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对的”。……等等。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他们玩弄的这一套，象游蛇一样，回旋于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似乎很全面、很公正，表面看起来不偏不倚，没有什么倾向性，实质上他们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纪平：〈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红旗〉1976年第2期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也是不对

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不对”，不鼓励科技人员为革命钻研科学技术“也不对”，……这种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平列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他们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用二元论代替两点论，用均衡论偷换重点论，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倾向性却十分明显。

柳忠扬审定的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文章，〈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国科学》1976年第4期

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1975年11月8日在教育部对周荣鑫同志的讲话

宁肯要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肯少学一些，也不要红色工程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迟群、蒯群宜1976年3月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说是生产上去了，火车正点了。……正点也是修正主义的正点，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余克家1976年5月10日在昆明师范学院政教系大批判组会议上的讲话

马天水在研究大屯煤矿工作的一次会上说：“只要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大会。”

上海勘察院揭发

1971年后，马天水多次对上海机床厂干部说：“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完不成任务也是伟大胜利。”

“生产上去了，路线不对头，要批评。只要路线对头，即使生产上不去，也要表扬。”

上海机床厂揭发

所谓科学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头的论调，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抓科学技术，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什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岂不是一概都要取消了吗？

延风：〈评唯生产力论的所谓新论点〉，〈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

“不做产值的奴隶”、“不做平方米的奴隶”、“不做土方的奴隶”、“不做工分的奴隶”、“不做分数的奴隶”（注：1974年初，“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上港五区炮制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姚文元胡说这个口号“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随后在各地报刊上出现了上述口号。）

转引自1977年3月25日〈解放日报〉

(三) 否认“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时而否定一切, 时而肯定一切

迟群及其一伙说：“对十七年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十七年可以一分为二，只能象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样一分为二”，“十七年路线错了，一切全错”。

引自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林克1977年12月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张春桥说：“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

引自《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揭发材料》

资产阶级完旦了，统战工作臭了，还搞什么统战机构？！

王洪文1967年11月在研究成立统战机构时的讲话

“我对十七年的教育深恶痛绝，恨得要死，恨得要命”，“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旧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在那里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地造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远新1974年12月在“朝农现场会”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还没有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观上好的知识分子。

张春桥1970年12月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大学组的讲话

“不算‘彻头彻尾’（注：指文艺界1964年前执行的是否是彻

头和尾的修正主义路线)，算百分之九十九好了”。

张春桥1970年12月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文艺组的讲话

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表现。是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的东西。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红旗》1970年第4期

现在从戏曲片中要找好一点的还没有，都是毒草，都是影射新社会的。

姚文元1969年12月12日在上海电影系统学习样板戏摄影组部分同志座谈会上讲话

他们（注：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某些资产阶级生物学家）把遗传绝对化，否认生物的变异，宣扬永远不变的遗传“基因”，这就是所谓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这种遗传学打着“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幌子，在生物学外衣下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宣扬“灵魂不死”的主观唯心主义，宣传“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这是二十世纪以来流毒很广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之一。

姚文元授意炮制的《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介绍，生物学之一〈遗传学〉》（1970年7月定稿）

我们工总司，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历史，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也证明了，这是代表新生力量，代表了前进方向的力量。……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张存桥1967年12月5日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当江青听人汇报所谓资产阶级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在美术学院有很深的根子时说）还有二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资产阶级几百年，封建主义几千年，是有影响的。但没有有什么可怕，戏剧一改革，八个样板戏一出来，不是把他们压垮了吗？！

江青1968年5月19日接见浙江革委会某些人的讲话

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

江青1974年6月19日在天津的讲话

（四）割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以普遍性 否认特殊性，以特殊性否认普遍性

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

《大事大非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红旗》1976年第1期

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

姚文元1972年10月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的讲话

要批判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

姚文元1976年1月6日对原《红旗》编辑部召集人的讲话

（《论总纲》一文指出：“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姚文元旁批：“否定纲举目张”。

姚文元对《论总纲》（1975年10月）一文的批语

我最近重读《毛选》，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

张春桥1976年6月12日在朱永嘉信上的批语

王洪文从批林批孔开始，就一直在我面前宣扬：“现在讲革命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过去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井冈山传统过时了，民主革命那一套吃不开了。”

肖木1977年6月5日揭发

（五）否认矛盾转化的条件，鼓吹抽象的统一性

张春桥说：“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上去了”。

引自上海市计委副主任申明1976年11月在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人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上的发言

抓革命，抓大批判，路线解决了，生产都上去了。

毛泽东1974年12月7日在辽宁武县东六家子公社的讲话

总的讲，学习抓好了，阶级斗争抓好了，生产就上去了。

王洪文1971年8月18日在上海耀华玻璃厂的讲话

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这样子，我们就有可能把革命高潮继续保持下去，这样会自然地促进我们的生产。

张春桥1967年8月在上海工总司的讲话

不要钻这个（注：指业务技术），这个没啥用，要突出政治，有了政治，业务就自然而然上去了。

张铁生1974年在辽宁阜新县国强公社兽医站的讲话

（六）肆意玩弄概念的灵活性，否认物质的规定性，大搞诡辩术

白马非马是辩证法，你看见过“人”吗？我没看见过“人”，只看见过具体的谁。白马非马是对的。

江青1974年6月15日接见梁效成员时的讲话

（王知常在一次讨论时，大肆贩卖佛教大乘小乘的那一套，当场有同志说他是搞诡辩）王知常说：辩证法就是搞诡辩。

王知常1973年6月2日在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会上的讲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世界一切国家都这样提的。没有一个国家不讲搞上去。这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

马天水1976年3月5日在上海机床厂党委办公室的讲话

什么现代化？实际是法西斯化！

王秀珍1976年3月6日的讲话

所谓“四个现代化”，其源盖出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
字号药铺。

……

……把“四个现代化”吹得震天价响，似乎很有点“实业救国”
的气味，其实是十足的投降卖国，倘若误服这帖毒剂，那么，我国
的自然资源，将“化”为帝国主义的廉价原料，国家主权将“化”
为乌有，社会主义所有制将“化”为官仔买办所有制，半殖民地的
苦难生活又将重现。

《药方只服古时丹》，1976年7月17日《文汇报》

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
资本主义。

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1976年第4期

我们好多企业是私营变为公私合营，官仔资本主义变为国营
的。以官仔资本转过来的企业来说，我们留用了大批老人马，他们仍

然代表旧的生产关系。

张春桥1972年10月15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加强企业管理，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复旧，复旧就是复辟。

王洪文的一次讲话。1977年3月31日王秀珍的揭发交待

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毛远新1973年3月在朝阳农学院的讲话

三、唯心史观泛滥

(一) 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

1、否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大反所谓“唯生产力论”

原市委写作组哲学组的一个负责人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斯大林提出的，是形而上学”，修改“是请示过王知常的”。（注：1975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十月，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头目朱永嘉下令修改《哲学小辞典》，在修改时，砍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合并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条。）

引自《关于〈哲学小辞典〉辞目变动情况》1978年3月

毛远新操纵、宗明兰主持的辽宁省理论讨论会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始终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引自1976年8月辽宁省宣传工作简报第31期

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

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

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红旗》1976年第4期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在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1975年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4年下半年，我看到《文汇报》介绍青年女工毛信贤同志的先进事迹，我就打电话给王洪文，问他这份《文汇报》你看过没有？王洪文说：“这份简报我看过了，心贴布、布贴心，文化大革命已经批判的东西，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王秀珍1977年3月31日揭发交待

这几年农村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

姚文元1974年4月6日对原《红旗》编辑部召集人的讲话

（《论总纲》一文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情况的改善来衡量’。”）姚文元旁批：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

（《论总纲》一文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地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姚文元旁批：生产好即政治好。

姚文元对《论总纲》（1975年10月）一文的批语

2、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鼓吹“政治决定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在《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与资产阶级的技术救世主义》题旁）姚文元批：资产阶级开始是拜物主义的，到没落时就成为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搞无产阶级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要突出政治。

姚文元1969年9月19日对朱永嘉送去的《透题计划》的意见

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的统一。在这些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它决定经济、业务与技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陈效：《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976年6月12日《北京日报》

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点上。他（注：指邓小平同志）反对我这一条，有意见，他说，你不讲生产。为此，我还加了一句，关于多快好省鼓干劲那一句。他后来说的什么不可分割的，我知道，他是讲我的。

张春桥1976年2月19日晚同马天水等人的讲话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订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

张存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

在阶级社会中，两个敌对阶级之间，或一个阶级中不同集团之间的重大思想政治斗争，都是路线斗争。……

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路线。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正是依靠了这条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赵高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代表奴隶主贵族篡夺了政权，中断了法家路线，代之以儒家路线，这是秦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第417—418页

3、鼓吹反革命的暴力论，叫嚷一切问题都要“暴力解决”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1976年4月3日的一则日记

要抓几个人、枪毙几个人才解恨。

镇反始终未触及到文教战线。应抓的就抓，应采的就采。

张春桥1970年1月14日在上海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
杀人。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材料之一》第103页

张春桥说：“那他要干什么？就让他唱（注：指有的演员要求演出时），唱了就抓起来，要发动群众斗，要闹事的就这么办。”

张春桥1970年5月5日在听取上海五·七京剧班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也是暴力革命，今后斗争看来也是暴力解决问题。

姚文元1976年5月上旬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陈真德的讲话

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把毛主席指出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了，使这些舆论阵地又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斗争是要依靠暴力的，不是和平过渡。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在革命群众斗争的暴力面前，一小撮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才被剥夺领导权，不是和平的，自然而然的，而是群众运用革命暴力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起来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

徐景贤1976年5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武斗死了几个没啥关系，只要把权夺过来就可以了，一切为了权。

王洪文1976年3、4月间的讲话

抗练联的历史证明一条真理，实力政策万岁。你没有实力就老老实实当奴隶，你们要立即组织力量打回马阵，发现他们在哪里打到哪里，一定要打得他们舒舒服服，不然我们今后如何做人，你们打好了，我负责。

翁森翰1974年12月25日在三台山枪枕练联厂医头头打电话时的讲话

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

梁效某顾问1976年5月2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1974年

(二) 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意志出发，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把阶级斗争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胡说没有儒法斗争，

“历史就不存在”

没有儒法矛盾，历史就不能存在。

江青1974年6月12、16日对黎澍的两次讲话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贯穿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

江青1974年6月14日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江青1974年6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揭示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法家主张进步革新，反对复古倒退，儒家则是颂古非今，复辟倒退。两千多年来，以法家为代表的进步传统，一次又一次地同以儒家为代表的反动思潮进行激烈斗争。

《改革·中国哲学史·教学取得显著成果》，1974年7月6日《光明日报》

2、歪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科学论断，宣扬反革命的“阶级关系新变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张春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上的旁批。引自《材料之三》第86页

我觉得，还是要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只有从这里才能看出你们所说的规律。这里需要具体地研究一九六六年以及以后的阶级关系。抓住这个矛盾，才能讲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张春桥1976年12月10日给朱永嘉、陈莫德的信

“任何一个政治事件都使阶级关系起变化的”。“肃反、反右使阶级关系变化了，文化大革命使阶级关系变化了，天安门事件也使阶级关系起了变化。天安门事件前后难道阶级关系没有变吗？我看是变了，要研究天安门事件前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朱永嘉1976年6月策划炮制《重观研究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变化》一文时的讲话

我们现在看阶级斗争，划分阶级，不是单纯看占有不占有土地，支配不支配整个财富利润，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看。

毛远新1970年6月5日在辽宁省整党建党学习班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阶级关系主要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不平等，促成阶级对立，阶级斗争。

宗明兰1976年9月5日在辽宁省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姚文元：《翰林赵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月

他们利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谋取私利，聚敛财富。他们不必拥有个人的土地、资本和股票，却可以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获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利润。这样，权力就变成了资本，权越大，资本也越大。走资派也就成了“资本的人格化”，即党内的资产阶级。

迟群、谢静宜1976年3月26日的一个汇报提纲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新形式的集中表现。

蔡正先，〈继续党内资产阶级〉（未出版）第35页

在旧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这种地位，已由党内资产阶级取而代之。

康立，〈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

吃老本就会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当然就成了革命对象。

毛远新1976年2月8日的讲话

（三）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鼓吹“超人”哲学

1、丑化和鄙视劳动人民

“我愿意当工人、农民，不费脑筋，整天劳动。”“工人本色

就是脏。”

江青1976年8月29日在天津手表厂的讲话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
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左派”。

张春桥的一次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87页

我感觉有些说法有些乱了，依靠整个工人阶级，好象工人内部没有矛盾了。那就不合辩证法了。

张春桥1974年10月14日在京西宾馆的讲话

从整个阶级来说，大机器生产组织起来了。但从一个工人来说，很多只管很小一部分，自己的眼界就狭隘，因此我们工人自己也有弱点，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如农民呢。一个农民的生产，是全过程的，一个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工种，有的前道或者后道的工序就不知道了，有的早班晚班也不联系。这是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的。看不到全局。

张春桥1975年1月9日的讲话

翁森鹤诬蔑坚守生产工作岗位的工人“不关心政治，只知一天吃三餐饭，做八小时活，十五号伸手拿工资，是‘八三一五’部队”。

引自杭丝联厂的揭发材料

贫下中农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

王洪文1975年10月在上海青浦县的讲话

几年来骂臭知识分子，他们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炫耀知识，压工人，应该骂臭知识分子。

张春桥1971年1月15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讲话

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了，没有事了，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王洪文1973年9月20日回原上海市总工会常委的讲话

改造教师就象在水中按皮球。压一压，压下去了，一松手又会浮上来。

徐景贤的黑话。引自中央统战部办事组编《“四人帮”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罪行的综合材料》

2、美化和吹捧封建帝王

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是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

……

刘邦死后汉朝为什么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吕后。

江青1974年6月14日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吕雉（吕后）……西汉地主阶级的女政治家，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女法家代表人物。……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她“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在楚汉战争中，她和萧河一起据守关中，稳定后方，征集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刘邦死后，惠帝年少，她亲自执政。惠帝死后，“临朝称制”。在她当政的十六年中，继续执行刘邦的法家路线和政策，巩固汉朝地主阶级专政，对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起了一定作用。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第77—78页

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代表面广，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比李世民的社会基础厚。

江青1974年6月14日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武则天……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她称帝十六年，实际掌权近半个世纪，政绩显著。她蔑视“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敢于冒封建社会之大不韪，自立为皇帝，这是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创举。

她坚持法家路线，和阻碍当时社会进步的孙无忌、诸遂良、裴炎等唐宗室贵族大地主集团，进行长期反复的斗争，多次粉碎他们发动的政变阴谋。她对徐敬业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武装叛乱实行果断的镇压，有力地打击和削弱了这股保守势力，坚定地维护中央集权制。当时有数以万计的人上书，拥护她当皇帝，表明这场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她的社会基础比李世民深厚，因而能够取得胜利。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第127—128页

秦始皇死后，法家路线就告中断，而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了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

编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年第10期

3、主观意志的自我扩张，自封为历史新纪元的创造者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到了东海之滨，全国老百姓也都到了东海之滨，舜到了南山之麓，全国老百姓也跟着到了南山之麓。中央文革小组也是这样，全国人民都听中央文革小组的。

姚文元1967年6月对上海专题写作组全体成员的讲话

江青：“我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呢？是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揭发。引自《材料之三》第203页

江青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

当有人把江青比做马克思时，江青带头鼓掌。

张天民揭发。引自《材料之三》第166页

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江青1975年在大寨的讲话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1974年夏以“琅琊台”笔名为其所摄庐山汉阳峰照片题的墨韵

张春桥：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算起，不算长，真正成绩大，化功夫大的，是这十年。

江青：从总的讲是从六三年开始。

张春桥、江青1974年5月23日在天桥接见文艺界代表时的讲话

无产阶级从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问题。自从六四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才解决了。

江青1976年1月21日对中国艺术团的讲话

在京剧革命的头几年，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如平地一声春雷、宣告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革命文艺路线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已经到来。

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年第7期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印

“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言论摘编

(内部材料，征求意见稿)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编印

一九七八年七月

编 印 说 明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阴谋篡党夺权。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是难得的反面教材。这本资料是为深入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提供一些批判的靶子。

资料主要选自“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代理人的反动言论和他们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个别条目选自“四人帮”影响下报刊上比较突出的反动观点。

“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惯于摘取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肆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以假乱真，制造了许多混乱。批判时要注意正本清源。

本稿是征求意见稿，编选中有不妥之处，请提出意见；有重要遗漏，请提出补充，并注明原始出处。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七月

目 录

一、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 (一) 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基本任务”规定为“分析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1)
- (二) 胡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它是整个资产阶级走向灭亡阶段出现的最后一种形态”……………(2)
- (三) 说“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3)

二、鼓吹历史唯心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 (一) 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4)
- (二) 鼓吹政权决定一切,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7)
- (三) 说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反映”,否认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产物……………(8)
- (四) 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9)

三、歪曲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搞乱革命和生产的关糸

- (一) 污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修正主义口号”……………(10)

- (二) 说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斗争上”，
攻击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是“否定
纲举目张”…………… (10)
- (三) 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
而然上去了”…………… (12)
- (四) 污蔑发展生产是“为资产阶级重新
登台作嫁衣裳”…………… (12)
- (五) 叫嚷“不要怕降低速度”，“颗粒
无收也不要紧”…………… (13)
- (六) 反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4)
- (七) 叫嚷要法家治厂，用专政办法办农业…………… (15)

四、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

- (一) 胡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
主义复辟之时…………… (16)
- (二) 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全党的大局，
全国的大事…………… (17)
- (三) 攻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
主义观点…………… (18)
- (四) 把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面污蔑为“技术决定一
切”、“科学至上”…………… (19)

五、胡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 (一)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 (21)
- (二)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 (21)

- (三)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因素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 (23)
- (四) 说“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24)

六、歪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

- (一) 鼓吹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 (26)
- (二) 污蔑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走资派所有制”…………… (27)
- (三) 污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的私有”…………… (29)

七、攻击国家统一计划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 (一) 把国家统一计划领导污蔑为“条条专政”…………… (30)
- (二) 污蔑《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 (32)
- (三) 不许说工厂是生产单位、经济组织…………… (33)
- (四) 污蔑加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是“复辟”…………… (35)
- (五) 反对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 (36)
- (六) 攻击岗位责任制…………… (37)
- (七) 攻击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38)
- (八) 鼓吹亏损有理，反对经济核算…………… (39)

八、攻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 (一) 诋毁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旧事物…………… (40)
- (二) 说按劳分配必然引起阶级分化，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 (41)

九、把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

- (一) 说社会主义商品是私人产品，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46)
- (二) 说社会主义货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48)
- (三) 说利用价值规律就是利润挂帅…………… (49)

十、攻击我国财政金融管理，搞乱商业政策

- (一) 攻击财政金融管理，鼓吹赤字财政…………… (53)
- (二) 胡说储蓄就是剥削…………… (54)
- (三) 污蔑商业部是“垄断资产阶级”，攻击和篡改商品分配原则…………… (54)
- (四) 鼓吹所谓“哈尔套经验”，破坏农村集市贸易政策…………… (55)

十一、诽谤我国对外经济关系

- (一) 胡说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就是“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是“洋奴”…………… (57)
- (二) 污蔑引进外国设备“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庸庸” (57)
- (三) 污蔑进出口贸易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 (59)

十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叫嚷社会主义再生产会不断再生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 (一)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62)
- (二) 说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62)
- (三) 污蔑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64)
- (四) 说社会主义再生产“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65)

十三、篡改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

- (一) 把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归结为“全面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67)
- (二) 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68)
- (三) 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69)
- (四) 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因素”斗争的集中表现…………… (69)
- (五) 否认向共产主义过渡要有物质基础…………… (70)
- (六) 否认所有制变革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 (71)
- (七) 叫嚷“都是文盲也不要紧”，反对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72)

一、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一) 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基本任务”规定为“分析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要批修。批刘、林、△，批托、布等。不批修，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好的。要知道，斯大林错误的东西影响还是不小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帮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市委写作组一九七六年选题计划上的批语

在这个伟大的革命形势面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好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读物，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编(以下简称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一页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批判修正主义、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影响的斗争中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它的基本任务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变为共

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行（到）社会主义革命。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五页

（三）胡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它是整个资产阶级走向灭亡阶段出现的最后一种形态”

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在一个会议上的谈话记录

资产阶级是以自由资产阶级的形态首先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当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则转化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形态。党内资产阶级则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推翻的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它是整个资产阶级走向灭亡阶段出现的最后一种形态。

秦正先（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一二八——一二九页

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出现的党内资产阶级，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内容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断变化；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关系虽然没有改变，但这种对立的具体形式却不断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在旧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这种地

位已由党内资产阶级取而代之。

康立（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三）说“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党内资产阶级与工人、贫下中农的尖锐对立，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因而，承认不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承认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根本标志。

延风《〈二十条〉的要害在哪里》，《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果不承认党内有资产阶级，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康健民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市县旗党委书记学习班上的讲话

二、鼓吹历史唯心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 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

一次革命高潮过后，必定有唯生产力论的思潮抬头。

张春桥一九六九年夏在上海同写作组一些人的谈话

〔《论总纲》一文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姚文元旁批：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

〔《论总纲》一文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姚文元旁批：生产好即政治好。

姚文元对《论总纲》（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文的批语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

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主席接着指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在这里，毛主席强调的是，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也一向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我们党制定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雄辩地证明，这场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但是，论“总纲”的文章，为了推行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极力攻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他们公然歪曲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那一段话，并采取掐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故意删去毛主席那一段话的后半部。他们抽掉革命来谈生产，认为不管走什么道路，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真革命”，就是“正确路线”。一句话，还是那个“白猫、黑猫”。按照他们这种逻辑，两个超级大国钢最多，原子弹最多，岂不是“最正确”，“最革命”的了？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经济上暂时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那岂不是“最不正确”，“最不革命”的了？请看，这些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荒唐到了何等地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翻案复辟的自供状》，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人民日报》

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总是大肆歪曲马克思主义，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他们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一方面歪曲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对于保证

新社会制度胜利的的作用的理论，把列宁的观点歪曲为，似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歪曲马克思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的理论，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成是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首要因素，鼓吹技术至上，专家第一。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第一位的东西。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四四页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实质上是用唯生产力论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秦怀文（即梁效）《论党内走资派》，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实行按劳分配的三个条件，要把次序颠倒一下。不要把生产力作为第一条，可放在最后一条，光有生产力不行，卫星上天，红旗仍会落地，我们是革命放在第一位，斯大林是强调生产力，把生产力放在第一位。

马天水一九七五年六月在讨论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发言

（二）鼓吹政权决定一切，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

谁有权谁就有了一切。……而有了政权，不管他是百万富翁也好，亿万富翁也好，可使他一个夜间一无所有。我们解放上海，马上接管了一切官僚企业变为无产阶级所有。如果今天无产阶级失掉政权，无产阶级的一切也就没有了。所以政权是个决定一切的大问题。

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电影系统大会上的报告

我们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在上海市川沙县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上升时，拜物主义，崇拜金钱。到没落时变相的技术决定一切。我们是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这个问题上有两条路线斗争。

姚文元一九六九年国庆观礼时对朱永嘉的谈话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道理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可以翻一翻《国家的起源》一书，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没

得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非要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的统一。在这些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它决定经济、业务与技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梁效《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始终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原辽宁省革委会宣传组编《省宣传组理论讨论会材料汇集》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

(三) 说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反映”，否认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产物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反映，是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与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

方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红旗》一九七二年第七期

还是联系阶级来讲，谈所有制问题实际上是权的问题。谈权首先是阶级的权。脱离阶级关系就讲不清楚。

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四) 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

讲我们价格制订的基础或中心是价值规律，这还是在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只是参考的和加以利用的，它不是我们制订价格的出发点。老讲价值规律做什么？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政治挂帅，要讲制定价格的目的性，不能离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否则就离开了政治。

马天水一九七五年六月在讨论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发言

对价值规律我们也要利用它，符合我们的目标就利用它，是在这个前提下有条件、有限制地利用它，否则就不用。

马天水一九七五年六月在讨论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发言

价值法则问题，不能丢掉也不能照办。

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四人的谈话

三、歪曲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搞乱革命和生产的关系

（一）污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修正主义口号”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世界一切国家都这样提的。没有一个国家不讲搞上去。这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

马天水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在上海机床厂党委办公室的谈话

赫鲁晓夫一上台也讲斯大林农业没搞上去，我要搞上去。所以机会主义头子都讲搞上去。

马天水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电表厂的谈话

（二）说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斗争上”，攻击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是“否定纲举目张”

革命派要总结历史经验，随时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上，革命者一生的主要精力应该是同走资派的斗争上，不然就会变成不清醒的人。

迟群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党委的学习要好好的钻一点，我还是倾向于每天半天学习。党委要认真学一点东西，天塌下来也不要管，无非是关车。支部书记抓大事，生产不要管。

王洪文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会的讲话

现在有些新动向，地震发生后有人要抓生产了，抓救灾了，不抓阶级斗争了。要抓上层建筑，不要忙于生产。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论总纲》一文指出：“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姚文元旁批：否定纲举目张。

姚文元对《论总纲》（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文的批语

国务院部门开那么多会，我们也希望引导我们到底怎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看不多，不是讲克服派性，就是讲生产。当然了，前边也讲基本路线，实际上落到具体的主要的都是别的那些问题。这样势必要模糊、冲淡阶级斗争这个纲，最后发展下去，导致

取消这个纲。

毛远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在辽宁省市、地委书记会议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他们还鼓吹唯生产力论，打着发展生产的幌子，诱骗工人阶级只埋头劳动，不搞革命；只管生产机器，不管国家机器；只拿锤子，不去拿印把子，忘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历史重任，放弃工人阶级反对党内走资派，革资产阶级的命，消灭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夏邦银《认清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同走资派斗争到底》，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江日报》

(三) 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

总的讲，学习抓好了，阶级斗争抓好了，生产就上去了。

王洪文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八日在上海耀华玻璃厂的讲话

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这样子，我们就有可能把革命高潮继续保持下去，这样会自然地促进我们的生产。

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工总司的一次讲话

现在关键是运动，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

唐岐山一九七六年春在郑州机务北段的一次讲话

(四) 污蔑发展生产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

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拉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合作“嫁衣裳”。

姚文元审定修改的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我要是工人，我也不上班，因为要复辟资本主义嘛。

王洪文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对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干部和工人代表的讲话

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

姚文元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路线不正确，打一千斤，是为修正主义打的，为地主打的。路线不正确，青藏铁路修的再快，也是为资本家修的。

迟群一九七五年五月对清华、北大处西藏工作的毕业生的讲话

他们咋叫生产上去的，我还可以叫他咋下来。

现在干就是为走资派脸上贴金。

唐岐山一九七五年八月对郑州铁路局机关干部上的讲话

（五）叫嚷“不要怕降低速度”，“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我不是今天讲，早已讲过了，不要怕降低速度。

张春桥在讨论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的讲话

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

只要路线正确，完不成生产计划也是伟大胜利。

马天水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室对上钢五厂和上海机床厂负责人的谈话

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修正主义的早点。

朱克家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在昆明师院政教系大批判组会议上的讲话

（六）反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主要学创业那一段。现在大庆是生产典型，搞资产阶级管、卡、压。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四月的一次谈话

大寨现在也提不出口号，就会大干、大干、再大干。我看到八〇年，全国机械化程度也不会比上海现在高。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四月底同其女儿张维维的谈话

大寨是生产典型，不要开大会（按：指上海郊区传达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的大会）了。

徐景贤一九七〇年九月在上海市常委会上的一次讲话

我看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就是不突出路线，没有讲阶级斗争为纲。

罗毅一九七六年三月底在浙江省委讨论《加强农业学大寨领导的通知》时的发言

农业学大寨，县委是关键我想不通。下面有资本主义，根子在中央，这是源和流的关系。

王少庸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在上海市郊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派工作队下去是要整基层，来掩盖中央出修正主义。

现在看来，市委幸亏没有派，如果派了就要犯大错误。

徐景贤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同上海县委书记的谈话

什么农业学大寨！你们把干部搞下去学大寨，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你们要的鬼把戏！

王洪文一九七六年二月在打招呼会议云南组会上的讲话

（七）叫嚷要法家治厂，用专政办法办农业

要法治，要法家治厂。

翁森鹤一九七四年初的讲话

（甘肃农业发展的阻力）一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二是小生产者、小农经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反抗；三是党内右倾保守思想的干扰和抵制。其中危害最大的还是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右倾思想。……他们是小生产者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言人。这些阻力、障碍怎么排除？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一条，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这一条搞好了，社会主义的农业才能大上快上。……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农业就办不好，就上不去。

姚恒汉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甘肃省委理论学习班上的讲话

四、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 胡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论总纲》一文指出：“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姚文元旁批：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

姚文元对《论总纲》（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文的批语

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

复辟之时！

梁效《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

什么现代化？！真是法西斯化！

王秀珍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在上海照相机三厂的讲话

（二）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全党的大局、全国的大事

他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在去年三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他胡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现在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在七月的一次会议上，又鼓吹：现在国内有许多事情要办，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工作要搞上去。在他一手策划炮制的“二十条”、“十八条”中，又进一步提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还讲：“执行三项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用恩格斯揭露“哥达纲领”的话来说，他的这票货色，“全都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

什么是全党的大局？什么是全国的大事？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是反修防修，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是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黄涛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上海万人大会上的发言稿

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

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他们把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蛊惑人心的大旗，到处煽动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以资产阶级政治，以修正主义路线取而代之。

《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三）攻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要组织一篇如《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有一些论点是可以批判的，如：……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能提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只适于教育，不包括科学。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电话记录

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也是一种谣言吗？

廷青《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文汇报》

他们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排斥党的基本路线，取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继续革命。从这个唯生产力论的论点中，可以引出一条与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康立 延风《〈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四) 把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面污蔑为“技术决定一切”、“科学至上”

《提纲》鼓吹什么“科研要走在前面”，就是要以科研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火车头”。这种“技术决定一切”和“科学至上”的谬论，是地地道道的唯生产力论。

《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八期

提出什么“科研要走在前面”。走在生产前面吗？“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走在革命前面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因此，“科研要走在前面”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谬论。这种谬论同叛徒刘少奇、林彪的“技术能引起整个社会变化”的谬论同出一辙。

《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中国科学》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提纲》宣扬说，如果“在科学技术上没有一个是大的飞跃”，“就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否定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也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一种典型的“唯生产力论”，是对“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六〇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无耻背叛。如果按照《提纲》所说的去做，“化”来“化”去，必将把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化”为乌有；“飞”来“飞”去，只能“飞”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去。这样的“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延青《〈提纲〉选批》，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他们打出“向科学进军”的旗号，引诱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方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五、胡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一)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

徐：现在的生产关系是否妨碍或破坏生产力？过去讲完全适应、基本适应，现在是否有破坏和妨碍生产力的情况，请你们研究。

王：要看是错误路线，还是正确路线。

徐：就是要讲在正确路线下，生产关系三个方面怎样破坏生产力的。因为这与资产阶级法权密切相关。

徐景贤、王秀珍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在上海市宣传工作座谈会
大组讨论会上的插话

当前问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甚至破坏生产力。

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
组四人的谈话

要突破老框框，要加强矛盾分析，不要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朱永嘉一九七一年夏对上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的
谈话

(二)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

张：走资派算在哪里？问题是，资本主义因素用的是社会主义外表，披着这种外衣搞资本主义。苏联的复辟，原来是所谓党员、

老工人、工程师（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来改变生产关系。不然为什么要不断革命？你们介绍的那种观点（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文化大革命是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这问题怎么说？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有些人是工人，有些人是工程师，这在哪一章讲？这不是相互关系。他改变了所有制，斯大林未解决。

（当有人讲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是三大差别时）

张：不是三大差别。

姚：还是资产阶级。

张：按你们刚才说，社会主义社会两种生产关系，我们国家内部还包括若干封建生产关系残余。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间就那么干净？按你们说，就只剩下三大差别啦？好象不大能答复别人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什么？

张春桥、姚文元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至少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看事实嘛，我们好多企业是私营变为公私合营，官僚资本主义变为国营的。以官僚资本转过来的企业来说，我们留用了大批老人马，他们仍然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搞得太纯，我看值得考虑。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副书记，里面成份很复杂，有的原来是资本家，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是叛徒，有的原是共产党后是走资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建立就很完善？！

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列宁选集》

第三卷第二五六页)。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由此而形成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八五——四八六页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同样兼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不过不是上面所说的那样两种对立生产关系的并存和彼此斗争，而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经济因素的并存和彼此斗争。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和该校经济研究所编（以下简称南开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九七六年修订本第六页

（三）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因素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旧社会传统或痕迹的集中表现，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资产阶级法权一旦被强化和扩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被腐蚀，蜕化变质为走资派所

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这种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格化。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六页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问题，不能不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逐步限制并最终战胜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这样一种斗争过程。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五年版大字本第一八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法权反映着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则代表着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

康立《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九页

（四）说：“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八六页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

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只要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党内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出林彪一类人物。

高路（即梁效）《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光明日报》

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一时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按照商品制度组织起来进行运动的，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七九页

六、歪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

(一) 鼓吹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

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企业领导权的归属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领导企业，必然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必然是资本家所有制。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九页

那末，怎样鉴别企业的领导权在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呢？这就要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过程中进行考察。各个阶级都是按照一定的路线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因此，只要看一下企业的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也就可以看出所有制关系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利益。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一页

在企业里，执行什么路线，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则决定着所有制的性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路线决定企业的领导权》，
《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二）污蔑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走资派所有制”

上海基层单位领导权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的）究竟有多少？……生产资料，好象在我们手里，实际上还是在资产阶级、国民党、走资派手里。领导权的问题究竟解决了多

少？有的解决了还会有反复。

张春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在讨论上海党代会决议会上的讲话

工厂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还没有多少。

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安亭事件”中对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讲话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工厂企业的所有权实际上就归哪个阶级所有。党内资产阶级在名义上没有私人的工厂、企业，但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通过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走资派所有制。

康立《论党内资产阶级》，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文汇报》

他们利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谋取私利，聚敛财富。他们不必拥有个人的土地、资本和股票，却可以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获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利润。这样，权力就变成了资本，权越大，资本也越大。走资派也就成了“资本的人格化”，即党内的资本家阶级。

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汇报提纲

走资派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一部分权力，在一些部门，实际上已改变了所有制的性质，变成资本主义的了。

迟群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在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三) 污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的私有”

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公有的产品，对于国家和别的集体，又只是这个集体的私有。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都还带有私人产品和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一〇二页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不仅表现在各个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过的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矛盾论》），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完这坐桥梁。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八页

七、攻击国家统一计划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一) 把国家统一计划领导污蔑为“条条专政”

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时，曾经在大、小各次会议上宣扬，上海工业生产为什么能够六八年超过六六年呢？主要是由于中央各部都瘫痪了。今后各部的机器一开动，上海的日子就要难过了。

王知常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交代

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时，曾经在大、小各次会议上宣扬：上海一九六七年农业为什么会丰收？就是由于政权机构瘫痪了，无人指挥了，所以农业丰收了。有人管，反而是瞎指挥。张春桥以后也曾经反复宣扬这一观点，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村机构都是多余的，有了反而碍事。

王知常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交代

上海一年不是上缴国家财政××××个亿吗！那我就少缴给他几十个亿，项目、投资，我们自己不会自行安排吗！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同黄涛的谈话，黄涛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揭发交代

金山是上海的金山，金山工程是上海的金山工程，你们要听上海的，不要听北京的。

黄涛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对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指挥部成员的一次谈话

“条条专政”根本不是靠党的路线和政策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而是靠手中的权和物来专地方和群众的政。只要他们一句话，让什么发展就发展什么，让什么关闭就关闭什么，要在那里建厂就在那里建厂。他们可以任意制订什么“大政策”，妄图出卖国家资源，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劳动人民的血汗。如果让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得逞，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在这种情况下，走资派虽然在名义上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却把管理权变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演变为走资派控制的私有制，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质，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苏修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不就是这样变过来的吗？

《重编“条条专政”的反动本质》，《红旗》一九七六年第九期

“条条专政”，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条条专政”，对党中央分庭抗礼，对地方竭泽而渔，对群众搞尖锐对立，对洋人则卑躬屈膝。

黄涛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华东组的发言

“条条专政”的要害，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条条专政就是党内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官僚主义者所有制，党内资产阶级所有制。

杨春甫一九七六年七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

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二) 污蔑《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

工业二十条，未拿出来，比七十条还凶，好厉害。要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所谓整顿，不是按主席路线、政策把企业搞好，而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顿的结果，在路线上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组织上大批撤换干部。结果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影响生产。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

王洪文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同黄涛的谈话，黄涛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交代

建议市委约一批基层单位的同志把十八条、二十条系统地批一批，把意见集中起来，正式报中央。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在《文汇报情况》（第一二八期）上的批语

这是一个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

姚文元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小册子“前言”中亲笔加的话

这个《条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贩卖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宣扬专家治厂，技术挂帅，制度万能，物质刺激，条条专政，洋奴哲学，等等，完全继承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衣钵，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条例》在理论上，是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它根本歪曲经济战线的主要矛盾，鼓吹“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和“技术决定论”，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否定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取消经济战线继续革命的任务。

陈佳忠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在福建省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不许说工厂是生产单位、经济组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企业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地，决不能把工厂看成单纯的经济组织，搞唯生产力论。

《批判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红旗》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条例》……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

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鼓吹唯生产力论，企图把企业办成单纯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企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企业办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

《砸碎修正主义锁链建设社会主义企业》，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到底社会主义工厂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同资本主义工厂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唯生产力论在我们头脑里就有市场。过去一提工厂，好象就是单纯生产产品的，就是完成各项指标，也就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这就是中了唯生产力论的毒。如果只是这样，我们除了所有制变更了之外，和资本主义工厂有什么区别呢？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工厂不但要实现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要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我们社会主义工厂同资本主义工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工厂不但要出产品，同时还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出人材，出教材，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不断地革旧生产关系的命，把工厂企业建设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阵地。

《最要紧的是分清路线是非》，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

《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

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四) 污蔑加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是“复辟”

领导不能只是集中、集中，管理、管理。我们不能只是管。在坐的工人是有切身体会的。厂里订了条条框框来管你，你们还不起来造反？

张春桥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在《城市中小学教育纲要》座谈会上的讲话

加强企业管理，无非是把刘少奇那一套，苏修那一套修正主义搬出来，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把工人手脚都束缚住了。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同王秀珍的谈话，王秀珍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揭发交代

上海工人绝大多数比较心情舒畅的，没有条例管，工作也可以做。

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十月在上海市委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社教就叫管理，没有别的管理。凡是搞多少条多少条的，不管几条都是不对的。

马天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在上海机床厂对党委常委的谈话

怎样加强管理呢？还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无非是立几条“王法”，让走资派对工人阶级实行“管、卡、压”。

方海《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本》，《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八期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不是攻击我们批判“管、卡、压”是扣“大帽子”吗？其实质就是想继续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剥夺工人群众对企业的管理权，用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或者用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腐蚀人们的思想，使工人群众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

方海《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本》，《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八期

（五）反对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主席只说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说过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

张春桥的话，马天水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揭发交代

没有那么些规章制度就不能进行生产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破了那么多规章制度还不是照样发展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靠规章制度还是靠政治思想工作？

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夏对朱永嘉的谈话

前时期提出要建立规章制度，什么中央的？这实际上是搞管卡压。

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的插话

〔《论总纲》一文指出：“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他的意思就是说，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姚文元旁批：工人是主人还是奴隶？严密到什么程度？连小便也计算时间那种资本主义制度吗？

〔《论总纲》一文又指出：“不符合这种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则要求人们及时地加以改革。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姚文元旁批：没有比这更赤裸裸的主张复辟资本主义了，把社义（社会主义）共义（共产主义）同资义（资本主义）完全等同。彻底代表资产阶级。

姚文元对《论总纲》（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文的批语

（六）攻击岗位责任制

大庆那个岗位责任制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王熙凤整顿大观园，也就是老妈子、小丫头来个岗位责任制，再加上物质刺激、小恩小惠。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四月底同其女儿张维维的谈话

岗位责任制，就是把工人定死在岗位上，不让工人关心国家大事，不让工人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同王秀珍的谈话，王秀珍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揭发交代

在生产上，我们工人要管全局，管全国的、管政治上的岗位，不提全国的、政治的岗位，只提小岗位，这是修正主义货色。

马天水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五七〇三厂的讲话

岗位责任制不能订死，订死了就是倒退，就是助长了个人主义。订死了，雷锋怎么出来呢？制度订得再好，总是有漏洞的，蒋介石的宪法，经过反复推敲的，我们共产党不是抓住他们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的么！

马天水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在上海钟表元件厂的讲话

他们把“建立岗位责任制”说成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妄图把工人死死地束缚在机器上，沦为机器的奴隶。

延风《〈二十条〉的要害在哪里》，《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把责任制提到“核心”的地位，目的是排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企图诱骗工人只要搞好“一件工作”，守住“一个岗位”，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听任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七）攻击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就是搞物质刺激。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同王秀珍的谈话，王秀珍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揭发交代

〔上海铁路分局一个装卸站正在学大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张春桥说：〕这都是极右的产物。

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十月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的讲话

在工代会上，对总工会的（问题）要彻底批判，包括劳动模范

制度。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在上海市革委会各组、办负责人会上的讲话

(八) 鼓吹亏损有理，反对经济核算

办农场嘛，不能讲赚钱，要讲路线，不能讲钞票，不能讲成本。

张春桥一九七一年一月在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崇明小组会上的讲话

成本核算哪能那么细，倒轧帐也可以。

马天水一九七三年在上海市革委会有关局一次汇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办工业、办经济事业？工厂为什么而生产，工人为什么而做工？是为了利润，为了金钱，还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这是需要辩论清楚的。

《批判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红旗》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八、攻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一) 诋毁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旧事物

从内容上看，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讲话

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按劳分配又是在保留着资本主义旧痕迹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它又必然具有资本主义因素。

南开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九七六年修订本第二九〇页

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的那部分劳动，是他个人的劳动。劳动者对自己提供的劳动保留着权利，可以凭借着它参予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同这种情况相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家庭也就将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在长时期内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的一部分，仍然要由家庭中那些具有劳动

能力的人来负担。这就表明，按劳分配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私字的框框。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七八—三
七九页

至于所谓要按“能力强弱、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就是公开宣扬为钞票而劳动，谁劳动得好钞票就拿得多，这是赤裸裸的物质刺激货色。这样“刺激”出来的，决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积极性”。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学习与批判》一
九七六年第四期

（二）说按劳分配必然引起阶级分化，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

按劳分配仍然是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框内的东西。它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和它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进一步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产生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按劳分配的外衣下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的情况，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快地产生出来。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八〇页

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扩大化，必然造成消费品分配中等级差别的扩大和不平等的加剧，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现象。

南开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九七六年修订本第
三〇二页

分配上的差别是阶级差别的重要标志。……分配关系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但是分配关系又反作用于所有制，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同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密切关联的。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五七页

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扩大化，必然反过来影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使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

南开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九七六年修订本第三〇三页

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权力转化为资本，又把资本转化为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基本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与官僚主义者阶级》，《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党内资产阶级的工资收入是一种剥削收入。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八四页

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说都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他们的工资收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从工人农民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中获得的。因此，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养活的，但却不为工人农民谋利益。他们占有这一部分剩余产品，实际上是对工人农民的剥削。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五九页

党内资产阶级的全部工作，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

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为此花去的精力确实也不少，但是他们越是在这方面绞尽脑汁，对党对人民的危害也就越大。他们的这种所谓“劳动”和资本家的那种所谓“劳动”有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是无偿地占有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果实，吸工农的血。

秦先正《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八五页

(三) 攻击工资制是“钞票挂帅”，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是“对工人阶级莫大的侮辱”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

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这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莫大的侮辱，我们铁道兵修了那么多铁路，靠的是计件工资吗？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一月在第二期中央读书班的讲话

这位老干部说：当时他并没有感到刘少奇所鼓吹的物质刺激有什么不对，因为工资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每月调整。在调整工资以前，又怎么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呢？这样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奖金。奖金可以根据每人每月每天的劳动表现，随时变动，能够充分调动积极性。但事实呢，恰正相反。实行奖金以后，结果是“月评月奖”变成了“越评越僵”。他当时由于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仅没有转过来，反而进一步推行了管、卡、压这一套，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现在，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

育，认识到过去这一套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变种。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按劳动定额记分的方法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计件工资制一样，资产阶级法权更为严重，它较易扩大社员收入上的差别，不利于社员之间的团结。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八九——三九〇页

（四）叫嚷要“彻底破坏”按劳分配制度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

我总希望能走出这条路，不是靠工分，靠物质刺激，而是靠政治工作。

张春桥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柴明小组讨论时的插话

我们是靠政治思想工作，不是靠工分。我们部队就不靠工分嘛，青年也总可以完全做到的。在农场种田为革命嘛，不记工分也可以。

张春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第四届党代表学习班柴明小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碰到大自然灾害，战争，就是能按需分配。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同朱永嘉、王如常的谈话

货币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起作用了。

陈阿大一九七六年八月底从上海去某基地时在餐车上的谈话

九、把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等同于 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

(一) 说社会主义商品是私人产品，社会主义商品 关系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在社会主义社会，产品既然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那末，一方要取得另一方的产品，就不能采取无偿的由社会直接分配的方式，而只能通过产品转化为商品，实行等价交换来解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一〇三页

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产品开始具有直接社会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全成熟，使社会产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私人性，还要转化为商品。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一〇四页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无疑作出过许多科学解释，但是他也认为：这种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

特种的商品生产，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可是，历史没有按照这个结论发展。苏联正是在所谓“特种的商品生产”的土壤上，大量滋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最终导致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发动反革命改变，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一〇四页

商品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的旧土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产品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只要存在着商品制度，就要计算产值，计算利润。这样，就存在着滋生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肥沃土壤。一小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想利用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就会乘机捞一把，掌握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对于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否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说法，不仅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必然要被修正主义者加以利用。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一〇六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〇二页

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仍然是商品交换的过程。商品交换是孵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温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都同商品交换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八九页

党内资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运动中，一方面从商品制度中被孵化出来，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利用商品制度发挥着孵化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功能。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五二页

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还拿定息，享有较高的工资，占有较多的商品和货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还没有取消的那些资产阶级法权上，强烈地要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大量地从商品制度中孵化出来。他们或者化公为私，贪污盗窃，把属于人民的货币、商品据为己有；或者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或者把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直接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两极分化。如果说，在几百年前，曾经从商品中诞生出来最早一代的资产阶级，那末，在现阶段，也一定会从商品中孕育出最后一代的资产者。

康立《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二) 说社会主义货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商品形式即是货币，货币可以储藏，穷富就会产生，高利贷就会产生，阶级也会产生。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业结合要利用货币交换关系；而货币交

换关系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二九——二
三〇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虽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货币同商品一样，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八三八页）。它的存在是同社会主义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还具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仍然是社会财富的结晶，仍然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货币和货币交换的存在，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这些跟旧社会都没有多少差别。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四一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尽管是非法的，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可以不断地从货币交换中孵化出来。党内资产阶级享有的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同货币交换也是分不开的。货币交换也是他们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经济基础。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四五页

（三）说利用价值规律就是利润挂帅

利润是价值的转化形态，利润挂帅就是价值规律“万能”的变种。

官效阔（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专政》，《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六期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而

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九九页

那末，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呢？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直接社会性生产，但是，它又仍然是商品生产。所谓商品生产，就是价值生产。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这种价值的生产，同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作为商品生产，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一种交换价值，它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交换其它的商品。这样，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转化为物和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就会转化为物的能力。这种情形，在社会主义生产单位总是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人所以能对于别人的活动或对于社会财富行使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底所有人。他在他的钱袋里随身携带着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同社会的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分册第九二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商品制度，每个企业（事实上是每个企业的领导人）也被赋予这方面的一定权力；也只有赋予这方面的权力，才能同社会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条件。

这种经济条件，不断地诱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走上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道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就受价值规律和利润规律的支配了，企业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在进行了，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在蜕化变质。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八六——四八七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只要它仍然存在商品流通即 $W-G-W$ ，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还会向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即 $W-G-W$ ，一循环，从属于 $G-W-G'$ 的循环，从而使货币变成资本。这是因为，无论是那一种商品交换，都是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这里，价值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者就显示出来了。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就会出现“价值追逐狂”，从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使用价值。在社会主义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利润挂帅、投机倒把等现象，实际上在实现着 $W-G-W$ 向 $G-W-G'$ 的转化过程，使后者具有独立的意义。一旦完成这个转化，劳动力就重新沦为商品，货币就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就复辟了。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九六——二九七页

这一系列广泛存在着的价值关系，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在商品的交换价值面前，各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否定着每个企业生产各种商品的个别劳动量。同时，用货币表现出来的各种商品的价值即价格，同商品的价值又不可避免地要有背离，有些商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有些则低于价值。这样，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时，以货币表现的各种商品价格总额——总产值，掩盖了各个企业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量的实际耗费情况。在生产商品时投入个别劳动量多的，未必会实现较多的总产值。相反，在生产商品时投入个别劳动量少的，也未必会实现较少的总产值。在商品的总产值面前，如同在货币面前一样，是没有臭味的。在花费个别劳动量大体相同的情况下，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完成总产值指

标，比生产那些价格低于价值的商品容易得多。这就会驱使社会主义经济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想方设法以较少的个别劳动耗费去获得较高的总产值，这就是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必然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甚至发展为“价值追逐狂”。这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必将竭力摆脱计划规律的调节，而听任价值规律去调节了。这种领导人实际上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资产阶级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五〇——五一页

由于有两种公有制，还实行商品制度，这样，商品生产的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这个价值规律，通俗地说，就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在价值核算中，成本、价格、利润这些价值指标，是同商品相联系着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要利用成本、价格和利润这些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也要利用这些经济范畴。虽然所有制不同了，但是这些范畴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它的基本特征都是以价值及其转化形态作为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条件不同的生产单位，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同旧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六六——二六七页

十、攻击我国财政金融管理，搞乱商业政策

(一) 攻击财政金融管理，鼓吹赤字财政

你们要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我有相当大的意见。

张春桥一九七四年在讨论国务院《关于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草稿)时的发言

财政赤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要把大家搞得很紧张。

张春桥一九七四年十月在全国抓革命、促生产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财政上有个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问题，还是按理办吧！
……需要的就是合理的，合理就合法。

毛远新一九七四年初在辽宁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在财政问题上，“条条专政”搞的，体制上是挖，权力上是收，指标上是压，支出上是挤，制度上是卡，真是竭泽而渔。

黄涛一九七六年七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革新、改造、挖潜唱得倒很好听，现在“挖潜”变成“挖基层的钱”了。这明明是挤块块，补条条；挤革新，补基建。是“刮皮主义”。

黄涛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华东组的发言

现在形势大好，但是财政银行部门专门看阴暗面。如果说今天的财务管理弱了，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你们认为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无非多贷一些款，少收一些利嘛，有啥了不起！

黄金海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市财政局专管员、信贷员大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的许多范畴，如财政、信贷、利润、利息等等，虽然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范畴都是商品制度的体现，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党内外资产阶级容易利用这些范畴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四七页

（二）胡说储蓄就是剥削

应该说谁储蓄谁剥削，因为你不劳而获呀！

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在辽宁省工农干校第一期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你们提出积极组织储蓄存款，得益少，损失大。

张春桥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财政工作汇报会议上的插图

（三）污蔑商业部是“垄断资产阶级”，攻击和篡改商品分配原则

商业部是垄断资（产阶级），连自由资（产阶级）都不如。

张春桥在北京同黄涛的谈话，摘自徐景贤听黄涛传达张春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一月两次谈话时的记录

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把工人阶级摆在哪里？
张春桥一九六九年在上海的一次讲话

菜农不吃商品粮。

张春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亲自审定批复的《文汇报》社
论的题目

(四) 鼓吹所谓“哈尔套经验”，破坏农村集市贸易政策

哈尔套举办社会主义大集是财贸战线带有方向性的新生事物，
是商业方面的深刻革命。

李伯秋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在辽宁省财贸战线会议上的讲话

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感到对这样的一个集市，如不加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就会通过这个缺口自由泛滥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怎么改造农村集市？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简单关闭，或者进行一般管理，结果，关，关不住，管，又管不好。另一种办法是，根据农村现阶段还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把过去投入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同时，组织供销部门打破常规，扩大购销范围，积极组织群众间的交换活动，有计划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

一九七五年元旦，这种新型的集市在哈尔套公社出现了。这一天，各大队的社员群众由干部带领，挑着自家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从四面八方赶到哈尔套街里，参加社会主义大集。他们把自用有余的农副产品交售给供销社，然后，再到供销社的门

市摊床选购自己需要的各种农具和其他日用品。……

这种集市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一出现就把资本主义势力给压下去了。……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办好社会主义大集，不仅是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措施，也是教育农民，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实际步骤。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象集市贸易、商品交换、自留地、家庭副业、按劳分配等等，在政策上是允许存在的。但是决不能给它供氧输血，使它无限制地扩大，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步加以限制。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为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提供了新鲜经验。

……

把供销社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社会主义大集好》，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

十一、诽谤我国对外经济关系

(一) 胡说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就是“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是“洋奴”

北京会议（按：指一九七二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反映的思想，上海也有。会议上的问题，不是几个人的问题，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有人说日本工业先进，反映了他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是洋奴。

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常委会上的讲话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于怎样实现“现代化”，曾经做过许多注脚。他们说要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要“多搞到”一些外国的科学技术资料，采取积极的“拿来主义”，甚至不惜将中国的自然资源主权出卖给西方资产阶级。“人家已有的基础”是什么？无非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拿来”什么？无非是超级大国争霸的科学技术资料。

延安《评“一切为了现代化”》，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文汇报》

(二) 污蔑引进外国设备“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

他们给大庆进口一套三十万吨乙烯装置，我挖苦他们说，大庆要进口，最好大寨的土地上尽开外国的拖拉机算了。这不是把毛主席

席树的红旗给抹黑吗？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一边批洋奴哲学，一边引进法国设备，怎么和崇洋媚外作斗争？怎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李伯秋一九七六年在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工地的一次谈话

辽化成套从外国引进设备，……我看是路线问题，整个合同路线就是错的，……把绞索套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叫人家牵着走。

李伯秋一九七六年八月在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工地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

方海《批判洋奴哲学》，《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为了“引进外国技术装备”，就要大量出卖国家资源，甚至把矿山的开采主权都出让给外国，这不是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又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了吗？这样，同出口有关的工业部

门将出现畸形发展；同出口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工业部门就会受到压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破坏，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将会遭到摧残。这哪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进口的装备越多，出卖的资源越多，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当然不可能自主。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三三页

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高路 常戈《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红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三）污蔑进出口贸易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

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进口设备要拿钱去买，就要有外汇。没有外汇怎么办？就拼命出口。甚至于考虑进口外国的设备来开采一些煤矿，用开采出来的煤炭换外汇偿还。这种办法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没有多少区别。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同外宾谈话记录

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

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啊，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要外国资产阶级出钱用外国的设备来开采我国的煤矿、石油，然后用开采出来的原煤等偿还外国的债务，这完全是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政策。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同外宾谈话记录

石油大量出口，换所谓先进设备造成的恶果。问题没有解决，实际把资本主义石油危机转嫁给我们。原油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宝贵，是化工原料。一是原油出口，一是煤、石油给人家（日本），他们给设备，再用油、煤去换，租给人家，用设备偿还，完全是卖国主义。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那些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必然赞成和拥护立足于向外国买船，即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对几封来信的批语

洋奴哲学，崇洋迷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

王洪文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同黄涛的谈话，黄涛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揭发交代

上海十三个进出口公司就是广州十三行，都是搞洋行买办的资产阶级。

外贸部就是洋行买办部。

那里的头头实际上就是洋奴买办资产阶级。

朱永嘉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同上海市委写作组外贸调查组成员的谈话

十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叫嚷社会主义再生产会不断再生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一)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九一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七七页

社会主义生产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八〇页

(二) 说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姚：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算不算阶级关系？！不算，算什么？

难道有非阶级关系？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党内斗争还是很尖锐、激烈的，处理这种斗争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一个阶级的先进部分尚且如此，一个阶级更不必说了。

张：不说是阶级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难道有非阶级的关系吗？

姚：先进和落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离不开阶级，你们能举出例子说明同阶级没有关系的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人们在生产中的各种关系必然要受到它的支配、制约或者影响。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也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带有阶级关系的性质，归根到底也要表现为阶级关系。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八〇页

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归根到底也就不能不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非关系。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则要推行资本主义的非，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由此而形成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也就是相互关系方面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彼此斗争的过程；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七四页

(三) 污蔑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 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一个特权阶层？我看是有，不过不好公开讲就是了。拿二、三百元工资，有汽车，好房子，算不算剥削？我说应当承认是剥削，是侵吞了劳动人民一部分成果。

徐景贤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小会上的讲话

合作化时有人满足于“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反对合作化；现在是“三、四百元一幢楼，汽车、警卫样样有”。

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修改辽宁省市、地、盟书记会议总结稿时加的话

现在有些人，当了大官，忘记了群众，把劳动人民所有变为一人所有，一家所有，一党一群所有。旧社会资本权力压迫工农群众，现在权力资本又来压迫工农群众，这样做早晚会被群众罢掉的，早晚会惹怒群众起来造反的。

宗明兰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在辽宁省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下，担负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代表，他们的权力，是劳动人民给的。他们的职能是在壮大所有制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总目标下，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为社会劳动。问题就发生在这里，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但它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职能。这种职能很容易导致“一长制”，使担负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代表从社会的公仆逐步地变为社会的主人，把劳动者同生产

资料分离开来，并且采取雇佣劳动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中重新结合。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四四—四五页

(四) 说社会主义再生产“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也将随着再生产出来。党内资产阶级必将利用这种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千方百计地加以强化和扩大，使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四三页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会再生产出共产主义因素，而且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法权。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一一页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奠定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实行正确的领导展开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九〇—四

九一页

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四八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100页

100

100

十三、篡改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

(一) 把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归结为“全面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和限制

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逐步地清除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以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击退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不断地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堵绝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五〇二页

对思想意识形态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从辩证法来说明。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我们这个阶级的，要反对它……

这个问题……原则上是好回答的，上层建筑一切反动思想都要实行专政。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七月七日在一个汇报会上的插话

(二) 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我有一个总的印象，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问题集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上。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对资产阶级法权到底搞清楚了没有？使人民都知道了没有？我们要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文章。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不理解，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还不理解。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在总政理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 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是右倾翻案的很重要原因。这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赞成，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不动法权。因此，要搞清主要矛盾。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三八二页

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在社会主义时期，对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什么态度，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继续革命还是停止不前甚至反对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六期

(四) 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因素”斗争的集中表现

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它们一面互相对立，一面互相联结，由此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的特点。这种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

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上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第五页

集体经济内部这两重因素的斗争，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的集中反映，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资产阶级法权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过来，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又总是巩固、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南开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九七六年修订本第一〇——一一页

在要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当时（按：指一九五八年）报刊上进行了一场大论战。斗争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程越《认真读书抓紧学习》，《红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五）否认向共产主义过渡要有物质基础

他真是一个物质基础的迷。我的那篇文章（按：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就提了一个意见，说共产主义要有物质基础。我说，共产主义的物质，我管不了。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十八条语录：“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在这段话下面

紧接着就讲：“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张春桥、姚文元在编选上述语录时，只选取了前一段话，砍去了后一段阐明发展生产力同消灭阶级的关系的话。

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时，特别强调了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列宁说，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着许许多多资产者。因此，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三大差别，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要逐步完成这样一个重大无比的历史任务，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允许扩大这块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庄岚《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三期

（六）否认所有制变革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

我赞成对过渡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现在是五个县、十个公社、十一个大队，今年秋后可否做到每个县都有试点单位？可否有几个公社全部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只是富社、富队，也要有穷社穷队，穷社的想法如何，值得关心，不要两只眼睛老是看着富社富队。……

社队工业需要发展，要帮助穷队，这都是对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社队工业，难道就不能过渡了吗？这可能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在朱永嘉六月二日信上的批语

（七）叫嚷“都是文盲也不要紧”，反对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反正，有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天就塌不下来，都是文盲也不要紧。

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十月三日在上海市委有关组办、驻沪三军政治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谈话

旧大学出来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啥事不干，啃了一大堆书，这大概够得上那个“样子”，算“有高度科学知识”了吧？其实呢，死啃那些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书本知识，多半为了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差不多了。要是全能忘掉倒还好一些，不忘掉的，留在脑子里，留得越多，受毒越深，就再也不想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一门心思要当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

方得（即肖木）《让教育革命的钟声响彻四方》，《红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四人邦”篡改 科学社会主义言论摘编

(内卫材料, 征求意见稿)


反毒备组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一九七八年

编 印 说 明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全否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阴谋篡党夺权。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是难得的反右教材。这本资料是为深入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提供一些批判的靶子。

资料主要选自“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代理人的反动言论和他们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个别条目选自在“四人帮”影响下报刊上比较突出的反动观点。

“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惯于摘取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肆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以假乱真，制造了许多混乱。批判时要注意正本清源。

本稿是征求意见稿，编选中有不妥之处，请提出意见；有重要遗漏，请提出补充，并请注明原始出处。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七月

目 录

一、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 (一) 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1)
- (二) 胡说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并由此引起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3)
- (三) 把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成伙法斗争史…………… (6)

二、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 (一) 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 (7)
- (二) 叫吐“改朝换代”、“彻底砸烂旧机田”…………… (9)
- (三) 炮制“全百专政”论，推行社会法西斯专政…………… (11)
- (四) 反军乱军，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14)
- (五) 否定发尸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 (16)

三、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 (一) 篡改继续革命的性质…………… (18)
- (二) 篡改继续革命的动力…………… (19)
- (三) 篡改继续革命的对象…………… (22)
- (四) 篡改继续革命的任务…………… (26)

四、篡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 (一) 攻击党的领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8)
- (二) 篡改党的性质，反对党的领导…………… (29)
- (三) 破坏党的组织设置，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 (31)
- (四) 破坏党的思想设置，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34)

五、推行反革命策略，以极“左”的百鬼掩盖极右实质

- (一) 鼓吹“怀疑一切”，煽动“造反派”“全百夺权”…………… (35)
- (二) 鼓吹“全百内战”，煽动打砸抢…………… (36)
- (三) 玩弄反革命权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9)
- (四) 妄图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40)

一、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一)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 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我最近也在重读（《毛选》），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

张春桥1976年6月12日在朱永嘉仗上的批语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张春桥在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上的旁批，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第86页

我觉得，还是要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只有从这里才能看出你们所说的规律。这里需要具体地研究一九六六年（以及以后）的阶级关系。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讲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张春桥 1975 年12月10日给朱永嘉、陈北德的仗

告朱永嘉，作阶级关系调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实际生活中阶级关系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搞不清楚。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很想作点调查。

张春桥1976年5月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陈北德的一次谈话

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看将来，并考虑我们的政策，（弄清楚今天

•以下简称《材料之三》。

各阶级的情况)也有必要。请你们试试看。不是“三打祝家庄”。¹只要有阶级,就要研究阶级关系,直到消灭阶级。……搞社会主义革命,事情很多,抓阶级斗争,事情也很多。但是对每个时期的阶级关系不作系统的研究,还是提不起纲来,或者在政策上处置不当,犯大错误。

张春桥1976年6月12日在朱永嘉仗上的批语

我们过去总是从这一方面,说有些同志习惯(坏习惯势力)到一个地方,先看党、团员,看老工人多,一看,这个组织好、纯。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党一再讲了以后,还老改不过来呢!

张春桥1967年6月8日在驻沪三军干卫会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看阶级斗争,划分阶级,不是单纯看占有不占有土地、支配不支配整个财实利润,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看。

毛远新1970年6月5日在辽宁省空党党学习班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还有一个问题提请大家注意,我们的阶级划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政治立场问题,政治态度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究竟怎么活?放到一个什么地位?因为你们也没有讲这个问题。究竟解放二十年了,他政治上的表现,在划分阶级和阶层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掌握?

姚文元1969年6月4日在关于小业主和资本家的情况和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看人不看户口本了,现在犯罪挨押的净是贫下中农。

毛远新1975年1月在辽宁彰武县的讲话

“任何一个政治事件都使阶级关系起变化的”。“肃反、反右使阶

¹张春桥从一九七三年起,几次三番下令要搞工人队伍调查、阶级关系调查。一九七六年五月的黑指示下达后,朱永嘉马上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班子”,并写信给张春桥,表示前两回由于没有领会他的精神,没有搞清楚“盘陀路”,结果没有成功,这回决心“三打祝家庄”,搞好这个调查。

级关系变化了，文化大革命使阶级关系变化了，天安门事件也使阶级关系起了变化。天安门事件前后难道阶级关系没有变吗？我看是变了，要研究天安门事件前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朱永嘉 1976年8月在授意炮制《重视研究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变化》一文时的讲话

“我愿当工人、当农民，不费脑筋，整天劳动。”“工人本色就是脏！”

江青 1976年8月29日在天津手表厂的讲话

王进喜是站在保守势力一边的。这些劳动模范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另外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保自己的荣誉，对继续革命就想得少了。

张春桥 1967年上半年在上海工总司头头会上的讲话

农民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

张春桥攻击陈永贵同志的言论。引自《材料之三》第89页

(二)胡说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并由此引起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党内确实有个资产阶级。*

姚文元的一个批语。引自《材料之三》第56页

关于一层人的问题，可以讲，但见（诸）文字还是要提一个阶级。

姚文元 1976年3月关于修改《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谈话

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

张春桥 1976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 梁效根据姚文元这一黑批语，炮制了《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这一黑文，并由姚文元作了转心多改。

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资产阶级中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原载：《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197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要把夺取政权的问题强调出来。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政权在敌人手里，在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手里，当时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你们讲是“附庸”和“工具”，还是讲代理人好。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究竟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同党内资产阶级实际上就在斗了，高岗、彭德怀，点了名的都是……。三反、五反时党外资产阶级还有力勇，你们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讲我们既反对了党外资产阶级，又反对了党内资产阶级，不如倒过来讲，更能反映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反对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才能更有力地反对党外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姚文元1976年5月13日给《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电话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关中的这种资产阶级政权的积习，就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恶习。由于无产阶级政权同时又是统一领导和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政权，因而这个政权的官僚主义恶习往往又是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那么，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恶习就是在这块土壤上产生的培育党内资产阶级的气候，……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68页

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些人（注：指黄维等），而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

姚文元1976年9月16日的日记。引自《材料之三》第11页

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很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革谈不上。

• 秦正先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

颠覆政权的不是荣（毅仁），当然荣也想搞，但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是党内走资派。

张春桥1976年11月、1976年1月同黄涛的两次密谈。引自徐景贤听黄涛传达张春桥谈话时的记录。见《材料之三》第4页

中央出多正主义是很危险的，而要中央不出多正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决定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是长期的现象，一下消失不了，党内资产阶级存在一天，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司令员就会存在，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头目，不但有司令员，而且会有总司令，有他们的路线、纲领和社会基础，有他们执行多正主义路线的具体步骤。

朱克家1976年5月20日在昆明钢铁厂共青团干卫学习班上的讲话。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新形式的集中表现。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35页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重要的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程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红旗》杂志1976年第10期

党内资产阶级、军内资产阶级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张铁生1976年8月13日在沈阳军区某师二营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35页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我们看来，就是说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而不只是有几个资产阶级分子或多正主义分子。因此多数同志认为，这个判断就给了我们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科学概念。列宁在分析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科学概念。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深刻地揭露了在无产专政条件下，处于被消灭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本质，也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科学概

念。这个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飞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在“四人帮”影响下召开的北京市1976年第三次理论讨论会上的一个发言，
《怎样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

(三)把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成队法斗争史

两千多年来的队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

姚文元加在197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的一段话

党内刘、林就是最大的队。中国长期伴随着队法斗争。前期一定有队，后期一定有队，现在也一定有队，要不然，为什么反孔批林？

江专1974年6月10日在天津批林批孔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队了，我们党内赶出了不少的队，……

江专1974年6月19日在天津市队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要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就没有孔老二了，就没有“队”了，就没有路线斗争了。从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看，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为什么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先锋队内，还有孔老二出现，这个道理得认真深思一下。

毛远新1974年7月7日在辽宁省委批林批孔会议上的讲话

五四以来，专孔与反孔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四人帮”控制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王知常1969年10月的一次讲话

二、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一)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全盘否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

解放后就搞社会主义革命，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这次（注，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

张春桥1968年1月15日在华东师大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的阵地十七年内一天也没有占领过，不要讲十七年，就是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也没有占领过。至于有的共产党员个人在这条战线中，工作做得好一些，这是另一回事。要看权究竟在谁的手里。

张春桥1970年12月23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文艺组会议上的讲话

搞了二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上海工人真正掌握上海的局势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工三队派出来以后。

张春桥1969年6月17日在上海一次学习讲用会上的讲话

上海基层单位领导权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的）究竟有多少？……生产资料，好象在我们手里，实际上还是在资产阶级、国民党、走资派手里。领导权的问题究竟解决了多少？有的解决了还会有反复。

张春桥1970年12月7日在讨论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决议会上的讲话

工厂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还没有多少。

张春桥1966年11月12日在“安亭事件”中对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讲话

我们一些基层，根本不是下分，而是全下权力就不在我们手里，有

的过去从来没有拿到过手里。

张春桥1971年1月4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上政治报告

十七年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培养的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远新1972年11月在辽宁省高级知识分子批斗空风座谈会上的讲话

还是十七年与五十天的老问题……你们争论这个题目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争论红线还是黑线，不会就事论事的。……提这个问题的人，总想把这一段说得好一些，他就光采了。

不弄“彻头彻尾”，弄百分之九十九好了。

张春桥1970年12月23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文艺组会议上的讲话。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校是资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专政已好多年了，现在是无产阶级推翻你们的政权，把政权夺回来的问题。

张春桥1966年6月25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国家是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子。你那个教育也不过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教育，你还有多少可吹的。

毛远新1976年6月2日、5日的讲话

总根子是辩帅这一点似乎还可以考虑。辩子党的头子应是那个被废除了的皇帝吧？应是个制度吧？不过不要再写文章辩论了，免得转移目标。

张春桥1976年3月13日在朱永嘉仗上的批语。。

-
- 在文艺组的会上讨论到一九六四年前文艺界执行的是否彻头彻尾的多 正主义路线时，张春桥讲了这段话。
 - • 朱永嘉在仗中向张春桥推荐《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的《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一文“似可一看”。张借题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讲资产阶级专政是客观发生的事实，确实是这样，资产阶级专政，地灾反坏右专了我们的政。这情况不仅是电影局，哪个单位都一样，查好了。

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在上海文艺、出版、电影、新闻等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叫吐“改朝换代”、“彻底砸烂旧机四”

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对马天水的一次谈话。引自马天水1976年11月5日的揭发交代

今天到会的全是造反派头头，到会的没有旧市委、旧人委的人，只（徐）景贤一人，真是有改朝换代的样子了。是要改朝换代呀！那些走资派还让他们再回来吗？

张春桥1967年9月关于武斗问题的一次讲话

张春桥把“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巳时期”这句话，写在文章的开头，含义是很深的。春桥写这句话有他的苦心，许多人都不领会。春桥要我把这篇文章拿到国家计委征求意见时，计委的同志讲：“春桥××这句话写得很好。我们国家现在确实处在很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本世纪内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把这句话和春桥讲了；春桥对我说：“他们不了解我的苦心”。春桥的苦心，是只可忍会，不可言传。我们现在正处在两代人的交替时期，苏联出问题，就是处在这样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过去了，我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变了。

肖木1975年4月12日在尻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次讲话

（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江志1975年9月17日在大窑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66页

人大、政协不要了。

张春桥手稿

资产阶级完旦了，统战工作臭了，还搞什么统战机构？！

王洪文1967年11月在上海研究成立统战机构时的讲话

西城区公安局问题很严重，已经调了五、六百名干卫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肯定也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卫队、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检文竟然检文到我们头上来了，查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官厅机构。

江青1966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

现在我再一次郑重提出，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揭开，……这个公检法不把盖子彻底揭开，害苦人了。它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

江青1968年2月21日对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浙江公安厅）他们对我每走一步，都要盯梢，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坏。（叶群高呼：要砸烂公检法！）你们的材料我看了一些。打倒反动的公检法！

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的反动公检法！

江青1968年3月18日对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公安机关内卫安插和发尸了一批坏人。在这一小撮坏人操纵下，有些方百，有些单位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妄图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王洪文1972年存在上海市公安局各处、分局、县局负责人和联络员会议上的讲话

公安机关不是掺沙子，而是要换土。……要下定决心把公检法

砸烂。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王维国1968年11月24日在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党委会上的传达

上海市公检法这条战线，从解放到现在……一直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地灾反坏右，而是对着无产阶级司令刀。

张春桥1967年12月19日在军二队进驻上海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的有些同志对公安处很逆仗，讲句难听的话，那就是特务机关。这个问题，路局革委会也好，分局革委会也好，没有引起重视，对公安局旧的公检法，还是要砸烂，而不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还是采取改良主义的，而不是彻底把旧的机构砸烂，用毛泽东思想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王洪文1968年7月28日在研究铁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 炮制“全百专政”论 推行社会法西斯专政

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仗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已，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已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采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段，这三段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全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已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

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部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深刻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部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列宁仅仅说过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张春桥在写这篇文章（注：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的时候，认为列宁的说法还不够，他认为只有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因为怕人家看了，会认为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才没有把这句话写上。

张春桥这篇文章……明确地从“四个一切”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第一次，是丰实了列宁的思想。

肖木1975年4月10日在院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次讲话

*列宁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这样的话。张春桥在引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话时，竟然插进了他自己伪造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部专政”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

池田：《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1976年第5期

同新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并逐步铲除产生它的土壤，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林彪》，《红旗》杂志1975年第5期

将来真正闹事的是这些知识分子，要搞复辟的就是这些人。

张春桥1969年6月25日在讨论有关落实资本家、小业主政策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骂臭知识分子，是因为那些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他炫耀他的知识，他以为他有资本，可以和无产阶级对抗，他用这一套东西来吓唬工人、农民，因此我们就骂。什么知识分子？臭知识分子！我看这个应该骂。

张春桥1971年1月15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传达第四次市党代会精神的讲话

什么叫教唆犯？你老师就是教唆犯。……如果说是教唆犯，你们学校是最大的教唆犯。

毛远新1974年2月19日在鞍山市十三中座谈会上的讲话

改造教师就象在水中按皮球。压一压，压下去了，一松手又会浮上来。

徐景贤1970年在上海市大、中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民主党派还要不要？是不是还要有人要参加民主党派？这也难说，如果参加后有什么待迁的话，比如发二文布票，那就会有人参加。对于这

个问题，议论了好几年。红卫兵是主张砸烂民主党派的。如果恢复民主党派活动，上海是少不了的。如果他们的尾巴又翘起来，我们就有斗争对象了。

张春桥1971年11月28日的讲话

文史馆都是些牛鬼蛇神。

张春桥1968年11月6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第八小组会上的讲话

（民主人士是）反动职务高，历史罪恶大。

毛运新1968年在辽宁举办的党外人士学习班上的讲话

专政不仅是对敌对阶级，而且也包括解决人民内斗矛盾问题，以至改造我们自己在内。

洪恒汉1975年5月23日在甘肃省委理论学习班上的讲话

凡是不听话的，都弄到“五·七”干校去，办他两年学习班。

王洪文1968年10月4日对王秀珍的谈话

（四）反军乱军，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什么解放军，都是老保！

王洪文1968年春节在张春桥家里设的“私人宴会”上的讲话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王洪文1975年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的一次私下谈话

如果苏爹、美帝真的打来，我怀疑作战师会有“维持会”。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付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

王洪文1974年3月15日在总参作战师汇报时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
第25页

批林批孔军队也不开刃起来了，是我批了铁卫兵的一封仗，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总政也在动了。我现在到处放火，把军队批林批孔搞起来。

王洪文1974年3月的一次私下谈话

洪文、春桥××，总参是有一些死官们？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如果真像来仗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

（张春桥批：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

江青1974年2月25日对一封来仗的批语。引自《材料之一》第11页

洪文××：海军问题得研究一下，空军也冷下来了，捂盖子、反（翻）案，不解决不行了。

江青1974年2月23日在一封来仗上的批语。引自《材料之一》第10页

洪文××：后勘问题看来得点火，如何做法待议后再定。

江青1974年2月23日对总后卫生部和后勘学院三人来仗的批语。
引自《材料之一》第10页

听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吧，八一造孽了，军伐（阎）管你们。春桥××，看来要夺权，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去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

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

江青1974年3月5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时的谈话。引自《材料之一》第9页

党内的资产阶级呀，在卫队尤其厉害。

资产阶级司令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咱卫队是什么态度？也去执行嘛，如果抵制的话，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跟着走、顺着干的话性质就变了，雇佣军或者是一个御用军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张铁生1976年8月13日在沈阳军区某卫二营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35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订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民兵指挥部于1976年炮制的对民兵“二传材料”。引自《材料之三》第35页

战争问题主要是把上海民兵搞好，你军队有多少？死守上海要借上海民兵。……平时不把民兵工作搞好，战时光借你那点卫队就行啦？今后打仗，主要借民兵。

张春桥1973年8月的一次讲话

工人武装制止武斗比解放军好。解放军有个“四不”，讲话也受限制。一武斗他们戴上一顶柳条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吗，我也是；你是群众吗，我也是；你辩论，我就同你辩；你打我，我也能打。看样子我们这个队伍比民兵好，因为都是造反派，是在阶级斗争中成立的。屁来有的民兵是在和平环境中成立的。

张春桥1968年2月20日在接见江西省革委会赴沪学习团时的讲话

(五) 否定发尸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一项基本任务

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物质，我就不管了。

张春桥1976年2月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谈话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得把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国民经济也搞不上去；或者一时搞上去了，最后还是又下来。

张春桥1975年12月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同黄涛的谈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世界一切国家都这样提的。没有一个国家不讲搞上去。这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多正主义口号。

马天水1976年3月5日在上海机床厂党委办公室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76页

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着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姚文元1976年4月26日在《红旗》杂志社的一次讲话

（三项指示为纲）这样提法就是冲淡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就要否定了，最后落实到哪呢？要把生产搞上去。国务院开门开那么多会议，我们也希望引导我们到底怎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看不多，不是讲克服派性，就是讲生产。当然了，前边也讲基本路线，实际上落到具体的主要的都是别的那些问题。这样势必要模糊、冲淡阶级斗争这个纲，最后发尸下去，导致取消这个纲。

毛远新1975年12月2日在辽宁省市、地委书记会议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尸生产喊得震天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引诱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姚文元审定多改的聚效、任明的反党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引自《材料之三》第176页

三、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 对象和任务，妄图篡党夺权

(一)篡改继续革命的性质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也是暴力革命，今后的斗争看来也是暴力解决问题。

姚文元1976年5月5日同陈永德的谈话

文化大革命是焚书，这次批林批孔是抗伙。我们现在不抗伙，他们就要抗法。

翁森鹤1974年1月在杭州屏风山的一次讲话

当前主要矛盾，是新干卫和老干卫的矛盾。

王洪文1972年5月在杭州同翁森鹤的一次谈话

如果写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讲了，再讲没有意思了；……你说它错吗，不错。但等于不讲，等于说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一样。

王知常1976年7月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党史组谈炮制《要重视当前阶级关系变化》一文时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老干卫，解决老干卫的问题，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

张春桥1967年4月的一次讲话

现在领导权究竟解决到什么程度？这次文化大革命，不说秋后扫落叶，也是扫得深一点。

张春桥1970年12月在上海市学习班大学组的讲话

这次运动（注：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根据林彪××讲的，拔一批、罢一批。

张春桥1967年3月1日的讲话

对坏人，搞到后，该查的狠狠的查，现在我认为不狠。好多地方还不狠。如对赤卫队*问题，等。

张春桥1968年2月19日的讲话

（二）篡改继续革命的动力

全心全意依傍工人阶级的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傍工人阶级“左派”。

张春桥的一次谈话纪录。引自《材料之三》第86页

我总觉得有些说法有些乱了。依傍整个工人阶级，好像工人内部没有矛盾了。那就不合辩证法了。

张春桥1974年10月14日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86页

现在上海工人阶级的成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老工人多半是破产的农民流到城市来，因而他们同农村有天然的关系；第二代工人大都（是）工人的后代，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他们对农村不象老工人那样了解了。现在的青年工人不行，他们不疼工人，更不疼农民，问题比较多。

张春桥1969年12月7日在上海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赤卫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一个工人群众组织。

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对立是天然的。

张春桥1969年10月17日在《海港》剧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还没有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观好的知识分子。

张春桥1970年12月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大学组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91页

知识分子按其本性来讲，那是很难改造的。

朱永嘉1975年初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讲话

“打开牢门解放造反派”，“踏破铁笼找战友”。

“四人帮”在福建的帮派于1976年提出的反动口号

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借革命造反派，就交给我们了。我们把队伍带好，今后总得管十几年吧！

张春桥1967年9月11日的一次讲话

朱永嘉、王知常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上，污蔑和分裂工人阶级，把工人队伍分成四下分，胡说什么：第一下分是老工人，他们“有的解放前就当包工头的，有的是技术工人，工资很高，革命到顶了。也有很好的老工人，受苦深。他们也有好处，地位变化了，生活条件变化了，继续革命觉悟差了。”第二下分是“解放前后当艺徒，‘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对党有忠诚，现在是工厂里的主要骨干。他们的问题是想物质刺激的多，受苏修的一套影响多，动不动要搞管、卡、压，动不动要搞物质刺激那一套。”第三下分是“五八年前后进厂的，这些人吃修正主义的桃子不多，不少人还是临时工，吃过修正主义路线的苦。六六年起来造反，路线斗争觉悟高，造反精神足，对文化大革命有忠诚，问题是党的观念少一些，劳动关没完全解决。什么事可干，什么事不可干也弄不拢。有些人造反有私心杂念，掌权后老是倒退，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新的

流氓无产阶级，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用过这种人，蒋介石也信这些人。这些人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基础。”第四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六八年后进厂的新工人，他们热情，单纯，学习努力，反应快，斗争经验很少，幼稚，没经过锻炼。”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王复初的揭发材料。引自《材料之三》第90页

（批林批孔初期）有一个张春桥的讲话我还有很深的印象，他讲：谁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我们造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我们看了这份讲话，心里象夏天吃棒冰，无限舒服。把他（的话）当作我们反潮流所要达到的标准。我们忌激张春桥毕竟是我们造反派的“贴心人”。在浙江我们要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为“双突”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我们那时天天所想入非非的就是造反派如何坐天下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批林批孔中要解决的最高问题了。用这个讲话作为经典，我们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天下，开会讲着坐天下，睡觉梦着坐天下，搞“双突”就是为了坐天下，而且我们仿效“四人帮”的样儿，要成为浙江的为造反派讲话的全权代表，以笼络人心。

俞森麟1976年11月7日的交代

闹派性、搞武斗的人，倒有点反潮流的精神，我倒喜欢用这样的人。生产好的人，往往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路线斗争觉悟不高。

王洪文1973年9月17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我想这样的专年（注：指打群架的流氓阿飞）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

张春桥1972年11月21日在关于召开上海市第六次团代会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不要看他们（注：指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有这样那样缺点，今后如有风吹草动，真的能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的，还是这些人。

王洪文1973年3月15日在钓鱼台对王秀珍等人的谈话

有事要多同（上海）总工会的一些老头头（注：指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商榷，多做他们（的）工作，多依借他们。

王洪文1972年9月对王秀珍的谈话

（三）篡改继续革命的对象

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生长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化为走资派，这是最危险的敌人，实际上是敌我矛盾。

徐景贤1976年2月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的一次讲话

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到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地、实、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标不了什么！

王洪文1976年3月的一次讲话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内走资派已成为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和核心，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斗争的主要力量，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因此，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越来越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我们公安机关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不仅要注意社会上老的阶级敌人，而且更要看到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就要求我们公安机关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时，注意他们同党内走资派之间的联系，重视深挖他们的后台，发现重要线索，及时报告党委。对走资派的现行反

革命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打击。

“四人帮”及其公安卫的党羽炮制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引自《材料之三》第19页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我国国内阶级关系的一个新变动。这个变动，是以阶级斗争已经进入到了反党斗争为主要标志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新阶段相适应的。

来源1976年2月的大字报《谁是刽子手？》*

这次文化大革命等于第二次进城，原来的机关干部除了造反派以外，相当于旧人员、留用人员，旧机构要砸烂，这些人员大部分要下去，要从基层选拔一批造反派上来。

张春桥1967年2月初在上海参加讨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草稿时的讲话

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已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江青的一次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1页

经过民主革命的人，至少五十多岁。现在掌大权的大多数人，是经过民主革命的，如中央各卫、各省市，再下地委，也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这卫分人伱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两种态度，轻则不满，重则反对。

马天水1976年3月2日在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今天的走资派。

肖木1976年5月14日在上海《朝霞》杂志编辑部的讲话

* 来源是朱克家在云南拼凑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笔名。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迟群1976年在清华大学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3页

关于“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一公式和“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规律。”这样的公式和内容是从“四人帮”那里来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远新都说过，时间大体是在七六年三、四月间。

迟群1977年6月5日的交代。引自《材料之三》第12页

他们所以那样有恃无恐，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法宝在身，有一个红色护身盔甲——老革命、老党员、老干卫、老功臣，冒着革命的金光，使人生畏，不易识破，他们很有市场，说话大家相仗，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关系。他极其严重地威胁着党的生存和国家的命运，……走资派代表着一切旧社会的社会关系，他身后站着一个小队的队伍，人家有路线，有政党，有司令卫，还有司令卫！

宗明兰1976年3月1日在辽宁省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悛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元和思想根元。

池恒：《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杂志1976年第3期

民主派有贡献的时代过去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存在了，历史发尸了，开倒车成了反动派。

肖木1976年5月14日在上海《朝霞》杂志编辑部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还在走，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路线不垮跟着走，明知不对硬着头皮走，思想合拍顺顺溜溜走，总之，党内领着党外走，下头跟着上头走，你也走我也走，大家都在走。

李伯秋1976年7月在辽宁省财贸会议上的讲话

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了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五·七”干校，在那里劳动的（人）身体很好了，但思想还是反革命。这样的人身体好了歪我们可凶了。

张春桥1970年12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坐谈会上的讲话

要抓几个人，枪毙几个人才解恨。

镇反始终未触及到文教战线。应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

张春桥1970年1月14日在上海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合作化时有人满足于“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反对合作化；现在是“三、四百元一幢楼，汽车、警卫样样有”。

毛远新1976年2月15日参加辽宁省市、地、盟书记会议总结稿时加的一段话

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

张春桥1976年2月23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在旧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这种地位已由党

原立：《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

共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而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组成成分，这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历史、思想根源的。

迟群、谢静宜1976年3月26日炮制的一个“汇报提纲”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资产阶级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

程越：《进一步发号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红旗》杂志1976年第8期

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池恒：《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号》，《红旗》杂志1976年第7期

承认不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承认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根本标志。

延风：《〈二十条〉的要害在哪里》，《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

(四) 篡改继续革命的任务

团结起来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更大的胜利。更大的胜利是什么？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你可以放十个卫星，但是如果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你放一百个卫星也没有用。

张春桥1970年12月7日在上海第四次党代会议起草小组会上的讲话

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张春桥1968年8月1日在上海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主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几年

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

姚文元1974年4月0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即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也是重砌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

陈绍昆1976年4月在冶金部党的核心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唯生产力论”是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那种接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攻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种种奇谈怪论，不正是“唯生产力论”在新条件下的翻版吗？

编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976年2月12日《北京日报》

他们之所以要在四个现代化和教育革命上大做文章，其险恶的用心就是要利用人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来腐蚀人们的灵魂，引诱人们离开无产阶级单纯地去发已经济，这只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打掩护。

方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

“所谓‘四个现代化’，其沅盖出于李鸿章之流创始的‘洋’字号药铺”。“把‘四个现代化’吹的震天响，似乎有点‘实业救国’的气味，其实却是十足的投降卖国。”

文汇报文章，《药方只服古时丹》，1976年7月17日《文汇报》。引自《材料之三》第198页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只埋头劳动，不搞革命，只管生产机口，不管国家机口，只拿锤子，不去掌握印把子，把工人化成替走资派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使社会主义蜕化到资本主义，亡变为社会帝国主义。

“四人帮”在福建的亲任庄志鹏在福建省工会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四、篡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一) 攻击党的领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著作)这些东西有一个作用，跟原子弹、氢弹一样，吓唬人。

张春桥 1972年1月12日在听取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汇报业务工作时的讲话

无产阶级从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问题。自从六四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才解决了。

江青 1976年1月21日对中国艺术团的讲话

马克思如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马克思就雇了保姆，这不是雇佣劳动吗？

王知常 1975年4月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平反同志的谈话

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

王知常 1976年4月对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的讲话

现在出毛选第五卷是适应右的需要。

王知常 1976年10月12日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吹风会上的讲话

“活学活用”，总不能弄错吧。……“急用先学，立杆见影”有时也会有的。如要写批苏修的文章，就去查列宁批沙皇的话，查来就可用上了，这不是“急用先学，立杆见影”？

张春桥 1972年10月4日在上海市有关组、办和驻沪三军政治卫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亡言》（注：指上海《前进农场亡言》）是有来头的，有好多话不是我们能说的。如马克思主义又失灵的问题，是体现了“张春桥思想”的。

朱永嘉1974年9月13日在上海前进农场的讲话

张春桥这篇文章（注：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明确地从“四个一切”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第一次，是丰实了列宁的思想。

肖木1975年4月12日在阮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次讲话

张春桥强调四个一切，从时间到空间论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百专政的问题。这是又一突破。当时的苏联，时间只到一九三六年，空间只专政到外国派遣来的阶级敌人，而没有提上层建筑一切领域。

阮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顾澄海1975年5月的讲话

（二）篡改党的性质，反对党的领导

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

张春桥1968年1月15日在华东师大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党的领导具体地通过党的主要成份工人阶级领导。

姚文元1969年6月6日在讨论《城市中小学教育纲要》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校谁来体现党的领导？其中主要一点是工人阶级派出自己的工队。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军队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红卫兵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等。

姚文元1969年6月6日在讨论《城市中小学教育纲要》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近我老想党的问题，怎么办？几十年的党如何改造，联想到我们的阶级、我们的队伍怎么样改造？

张春桥1967年11月22日在研究召开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时的讲话

你看嘛，你们的旧党委垮台快三年了吧？这三年过得不是蛮好吗？可以不可以不要党委呢？

……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在中央，在毛主席，何必要这个党委呢？

……

一个厂里屁有很多很多机构，一月革命后，统统垮了，只剩造反派掌权，那也蛮好的，什么都管。后来又成立革委会，就有了“两委”。要是成立党委，那就成了“三委”，再一查团，就有“四委”。（徐景贤插话：还有文攻武卫。）是啊，那就有了“五委”。还有什么？

……

就一个革命委员会不是蛮好吗？将来好多机构，一开会，一开名单就是一大片。

……可以不可以不要党委？我是主张敞开思想讨论的。

张春桥1969年6月15日在上海查党追党三个试点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转简。

张春桥1967年5月的一次讲话

（学校党支卫与革委会、工卫队、红卫兵团的关系）这些问题，扯一年也扯不清楚，……谁领导谁？要看谁比较正确，……谁正确，服从谁，……相互关系还是按此作标准。

张春桥1970年12月24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第三十九小组会上的讲话

造反派就是党支卫，队委就是支委，不要屁来那个党支卫了，让造反派来起党支卫的作用。

张春桥1968年在上海查党追党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建议（四川）大足厂的群众踢开领导班子自己闹革命，组织成新的领导班子。

王洪文1972年12月29日在一份文件上的批示

形势好不好，要有个标志：凡是党委机回不转的地方，就是形势大好。凡是党委还在实行领导的地方，党委机回还在转的地方，就是形势不好。只要党委的机回还在转的地方，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砸烂他的机回，使他不转动。

俞森麟1974年2月20日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讲话

工代会下的命令，支卫要执行，不执行是错误的，不通，可报告上级党组织。

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在接见上海市工代会卫分委员时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时，县委不起作用，生产搞得也不错嘛！

王洪文1976年2月25日晚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三）破坏党的组织建设，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

旧市委这个组织不行，现在提壑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联共党是多次重建，每一次阶级斗争过后，就搞一次涛党，涛党是从苏联来的。毛主席提壑党，从思想上壑，实际上也是涛党。……过去我们讲，有一些实在不象党员，但是没时间搞掉他。这次运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要相当大下分改造，有的是重建。

张春桥1968年1月15日在华东师大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党组织不能恢复，又不能依借，还得去改造它。

张春桥1967年3月8日接见山西省太原市代表时的讲话

(选拔党员、干部的标准)“以活材料为主”，“档案只能作参考”，“社会关系复杂也不要紧，一切都要根据需要”，“叛徒有什么关系，就是真正的叛徒，只要江专相仪就行了”。

王洪文1973年在上海市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砸烂”的岂止公检法呢？我们各级党委都是“砸烂”了嘛！……东北局、省委不也“砸烂”了吗？

毛远新1973年11月25日在辽宁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怕人家说我们搞小集团。

江专1975年1月四届人大期间在北京前门饭店的一次讲话

(人事)档案吗？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看得太神秘了。他能检查认识错误的話，你们可以不要打下去嘛！能检查还是好的嘛！

张春桥1967年5月26日在上海玻功机械厂的讲话。

对知识分子怎么看法？复旦大学要大大吐故一批，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出党。

姚文元1969年5月16日在上海市新闻界负责人和写作组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凡是反潮流的人都可以入党、当干部。

翁森鹤1974年春的讲话

过去我们为什么日子总是很难过？就是没有权嘛，所以只好由他们头颈摸了过，因为你不园（注：指不是党员），最多只能管工代会。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我们这批阿卯（注：指少正卯，翁森鹤等人把自己

• 当上海玻功机械厂的人谈到该厂有一个人在接管人事档案后，将自己的一份档案材料拿出毁掉，被撤销厂革委会委员和战斗队队委的职务时，张春桥讲了这一段话。

比作少正卯），要在政治上翻身的好过，必须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否则全是空话。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吃这个亏了，要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利用我们政治上占上风的时候，尽快地磨园（注：指突击入党）一批。

翁森鹤1974年3月底对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黄荫堂等人的谈话

搞“双突”好比吃鱼汤，你吃一口也腥气，干脆喝它一大碗，也不过如此。

翁森鹤1974年9月在杭州群凤山的一次讲话

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党中央的点。

江专1974年9月24日在小靳庄的讲话

你们信任我，是信任主席。

江专1976年10月3日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讲话

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江专1975年9月在大窑的讲话

（中央政治局通过电报《梅霞》时）我要在场，我就大闹政治局，绝不会让他们通过。

江专1975年9月在大窑的讲话

党委书记可以否定几个付书记的忍见，重新再议。你连这一点都不怙？

迟群 1975年11月11日在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谁要是泄露班子（注：指“四人帮”控制的“果效”写作班子）的

机密，那老实不客气，立刻请您离开班子。有人可能说，我正不愿在这儿，正想回去呢。没这么轻松。你回原单位，也得在那儿给我做检查，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

迟群1974年9月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的讲话

（四）破坏党的思想建设，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张春桥1965年在《沙家浜》上沪时对《文汇报》陈虞孙的谈话

我们上海的做法是：百家争鸣，一家做主，我们是听江青的。

张春桥1964年6月24日在上海文艺会场的—次讲话

每个党员都必须对我和小谢的讲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不表态，就是党性不纯。

迟群1976年5月下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电话“指示”

相相百，可以发现不少人，了解一些人。相百也是调查研究。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王秀珍1974年3月30日的传达

用死人讲话，叫大家哭一通（注：指用回忆对比方法进行阶级教育），就能解决问题吗？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1976年12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上海代表的揭发材料

五、推行反革命策略，以极“左”百鬼 掩盖极右实质

(一) 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煽动“造反派” “全百夺权”

“对十七年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十七年可以一分为二，只能象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样一分为二”，“十七年路线错了，一切全错”，“要和十七年对着干”。

迟群的黑话。引自清华大学党委付书记林克1977年12月在教育卫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要注忌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内，在中央。

张春桥1976年2月底的一个批语

你们刮沈于风，斗斗周伙芳之流，太小了，应当矛头向上。

张春桥1967年1月26日对上海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讲话

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点丁住当权派。首先看第一把手，要丁住支卫、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丁一层。我们学校就要丁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卫。教育卫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

迟群1976年6月22日在教育卫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
第72页

• “在中央”下百的横线是张春桥加的。

眼睛盯住中央，瞪得大大的，把头上的角磨得尖尖的，把身上的刺长得硬硬的，要敢于放炮。

宗伯秋1976年6月在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会议上的讲话

老农说，从严格意义上说，一些方百、一些单位的权，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一月风暴中夺过来，有时夺过来又失掉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也就在这里。不然，还批林批孔、批复辟倒退干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多少次？

张春桥1974年2月27日给马天水的仗

要在政治上把老干刀打得晕头转向，乘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就动手把权夺过来。

翁森鹤的黑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00页

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开丘全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寸权必夺”^{*}。我们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还被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据的权力统统夺回来！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1967年2月5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手稿

（武斗）死了几个没啥关系，只要把权夺过来就可以了，一切为了权。

王洪文1967年春的一次讲话

（二）鼓吹“全百内战”，煽动打砸抢

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借打内战来解决。

张春桥1974年3月13日在总后汇报时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26页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张春桥在这里竟把“寸权必夺”说成是毛主席的教导。

你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和平呀，那有什么意思呀！不利于斗、私、修、反，咱们不干。

张春桥1967年5月14日在南京地区群众组织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不要怕乱，不要怕武斗，不要怕破坏，让他们去搞好了，让他们去乱好了，让乱透了再去治，才能收效。破坏了再建设嘛！

张春桥1967年9月关于武斗问题的讲话

（武斗）“我带头指挥打过的”，“我亲自干过的”。

王洪文1975年7月28日在杭州第二棉纺厂的讲话

对抢，我是一个老抢手。你不抢，那来的东西？

王洪文1969年6月19日在上海红艺织造厂的讲话

中国近代史上詹大悲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大乱是大好事。

姚文元1974年1月14日在阮上海市委写作组各组负责人汇报会上的讲话

要把权拿到自己手里。

姚文元1967年2月9日对上海市一级群众组织一些头头的讲话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斗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就拿起武斗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战斗的协议之后，他们仍然不把武斗收起来的话，你们的自卫武斗不能放下，……当他们不放下武斗，拿起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斗，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江青1967年7月22日对河南代表团的讲话

我今天是来放火的，反正闹就闹，武斗就武斗，几十万人武斗也可以，有人借此机会闹就闹。

张春桥1969年7月21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看到有些抄来抄错，在门口贴上红纸，我一看就气。这是在给我们的红卫兵抹黑！抄错了，就不要说话。

.....

你们红卫兵要真正发挥作用，有的别人不好做的，我们不好说的，你们红卫兵就说嘛。我是不怕，因为我们有限制。

张春桥1967年3月12日在上海市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群众起来了，表面看很乱，甚至发生武斗，夺刀队枪，就觉得形势不好了，看一看，这正表示群众发动起来了。

张春桥1968年1月31日在上海警备团干卫战士大会上的讲话

开门办学中的问题就是各地运动的问题，首先迁到各地运动的形势。今天上午交流开门办学的经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主课。有的怕介入。我说怕什么，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就介入了。要积极主动争取条件参加当地运动，不要叶公好龙，怕这怕那。

迟群1976年7月3日向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介绍清华黑经验时的讲话

现在眼看快放暑假，各地学生所在单位都来仪让赶快回去讲讲清华运动情况。（谢静宜插话：也有干卫担心乱。）怕学生回去又把思想搞乱。我说这是好事，找都找不到，无非去受点教育，即使个别变了挽救不过来，也使我们党委受点教育。无非运动也是开门办学，无非比七八九（注：指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还七八九。运动搞了这么久，这点经验没总结出来不是白搞了吗？不要着急，一着急往往会在策略上犯错误，导致方向上犯错误。现在走资派很注意革命斗争上的策略，他刺激你一下，不要上当。

迟群1976年7月3日向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介绍清华黑经验时的讲话

要充分发动群众，要有实力，武斗要有实力，要依借自己的力量。你们造反派手中没有枪？你们手中有枪，为什么还被人打了，你们是举枪投降了。

“四人帮”在福建的亲仪郑重的一次讲话

(三)玩弄反革命权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只要依傍群众，就是犯错误，我们是同群众一起干的。……群众也有份。

张春桥1968年3月21日在上海市革委会召集的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上的讲话

过去走资派犯错误，就是因为同群众间对立，你不快这一点，说不得造反派……。就是群众错了，也要站在一起。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在接见上海工总司委员时的讲话

(我看历史) 看来看去无非都是权术。现在实际上许多事也都是权术。我现在算是看透了。

当干卫的人，一定要懂得权术。如果思想好，而不懂权术，那只能做雷锋、做王杰。

王知常1976年3月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专年的讲话

现在人家班子齐了，席位满了，不能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次都赶下去。现在夺权只能借钻，借挤。好比进戏院子看戏一样，先要让人家开门，否则，你在外百大吵大闹都是空的。宁可先说几句好话，让人家愿意开门，只要开了门，那怕是条门缝也可以，先从门缝里挤进去一个，然后把门挤开点，就可以进去一批。进了门，有多的位子就占，没有多的位子就挤，看谁的劲头大。这就是说，要发扬钉子精神，能钻，会挤。

挤也好，钻也好，都要看火候，抢时机，好比打篮球一样，比赛开始，大家就拼命地抢球投篮，否则，哨子一吹，比赛停止，就不准抢了，再抢就是犯规，投篮无效，这就叫做发扬打篮球的作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些单位动手早，进班子的人就多。有的拖拖拉拉，失去时机，就空忙一阵，结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们要班子放下点，胆子放

大点，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只要进了班子，不犯大的错误，位子就是我的。

“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胡勇1976年2月在长沙汽电厂召集帮派成员策划夺湖南省委领导权的黑会上的讲话

第一，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打得厂里的党员、群众晕头转向，乘他们没有醒过来前，发尸一批党员；第二，搞得厂里的几个老干卫工作不下去，都要离开抗丝联；第三，动手要快，不要等到上级发觉，我们已经搞好了，造成既成事实。夺权好比吃饺子，一碗饺子别人要吃，你只要吐上块唾水，别人就不要吃了，都归你吃了。

俞森鹤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讲话。据该厂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1977年3月9日的揭发

争你高我低，你大我小，争来争去不肯休，结果把大好时机争掉了，西瓜打破了，大家吃不成，现在人家要摸你头颈了。如果把老中专班子搞好了，现在日子就比较过好一点了。

俞森鹤1974年10月14日在浙江省工六队员授奖大会上“空讲国庆社论”时的讲话

现在运动就是搞大矛盾，矛盾搞大，通过斗争发尸了，事情就解决了。……我们就是要制造大矛盾，要弄得大。

俞森鹤1974年2月18日在绍兴地区上访团召开的批林批孔报告会上的讲话

现在老干卫大干卫分是代表旧事物的，能打倒（就）打倒，不能打倒（就）打跑，打不跑（就）打广打伤。

迟群1976年3月下旬对太原铁路局一反革命分子的谈话

（四）妄图揪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全世界资产阶级把上海叫作左派的堡垒，堡垒是容易从内卫攻破的。我希望市委的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自毁长城，要巩固团

结，巩固这个革命的堡垒。

张春桥1974年4月9日在朱永嘉4月9日仗上的批语

上海一定要搞好，上海是以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张春桥1975年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对黄涛的谈话

我们要疼得把上海工作做好，对全国有重要意义，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把工作做好这是很重要的力秀。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同上海工总司头头的谈话

春桥这么长时间在上海，稍为动点脑筋就如迎了，上海我不住，对全国，对世界都有影响。

王洪文1968年4月12日上海出现揭露张春桥反动历史的大字报后在上海电视台的一次讲话

从肖木的谈话中，如迎你们这一段压力不大，甚至没有感到多大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不注意阶级斗争，或者这方百的观念淡薄了，总要犯错误的。我这里说的是大局，不是个人的祸福（当然，个人同阶级的命运是分不开的）。也不是局下的、个别的问题。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都需要研究，否则，你们将会失去战斗力。

.....

鲁迅所说他为什么要吃药、吃鱼肝油的那段话，始终鼓励着我。

张春桥1975年12月10日给朱永嘉、陈北德的仗。

-
-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四人帮”多次严肃批评，使“四人帮”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封仗是张春桥向自己的亲仗吹风，要他们增强反革命的“战斗力”。仗中所引“敌存灭祸，敌去召进”，是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敌戒》中的话；所提鲁迅的话出自《坟·题记》，原文是：“即如我的戒沉，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全是为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张春桥引用这些话，是为了发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刻骨仇恨。

(上海)市委内卫的团结,要很好注意。去年七、八、九月那个时候,容易团结一致,现在外卫的压力轻了,内卫的团结可能出现問題。……现在这个时候,容易犯错误,不团结,不谨慎。要注意哟!

张春桥1976年2月23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

一方百要提高警惕,一方百要提高信心。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

党看到曲折,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就是北京炸平。相仪各地会出领袖,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领袖。林彪、△△△要搞上海没有搞成,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1976年9月下旬的一次讲话

现在你们是工总司委员,过了几年,你们有的可能是市委书记、付书记,有的是中央卫长、付卫长。

张春桥1967年12月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要多选一批干卫到中央工作。本来我不大愿意从上海抽干卫,多抽了又要说上海邦,现在感到有需要,就要抽!

张春桥1973年在十一届一中全会期间同祝家顺等人的一次谈话

“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卫送到各卫”,“象张铁生那样,到卫老谷那里去闹个天翻地覆,才能起到沙子的作用”。

张春桥1973年9月在“十大”以后对王秀珍等人的谈话。

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老年干卫,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卫、商业卫、建材卫、邮电卫、中组卫、卫生卫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

王洪文1974年3月对王秀珍的谈话

上海要准备一百名干部，随时准备拉出去。

王洪文1974年8月的一次讲话

最近辽宁（注，指毛远新）同我们通电话，提到要向中央各下送人，过去想不通，现在他们想通了，要把张铁生那帮身上有刺的人送去。我们上海也要准备送，多选一点、物色一点真正路线觉悟高的、敢于反潮流的人。

王秀珍1976年2月7日在上海市委组织组各小组负责人会上的讲话

今后写作组的人出去，可以结合慰问团的工作，到外地去做一些社会调查。

姚文元1975年初四届人大开会期间在家里同朱永嘉的个别谈话

应当改变方针，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对革命派，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杀回去；对保守组织，应当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觉醒过来。一时弄不清的，加以调查。要组织一个班子，准备接待十万人。这是上海的义务。要旗帜鲜明，否则，有损上海革委会的威信。做好了，对全国造反派是很大的支持。

张春桥1967年7月31日在上海提议中央文革责成各有关地区劝阻群众来沪问题的电报上的批语

乱透了的地方，才能真正锻炼左派，左派才能掌权。

迟群1976年6月24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
- 据朱永嘉交代，这是姚文元要派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到外地去为“四人帮”搞特务特报活动。

“四人帮”篡改科学 社会主义的言论摘编

(供批判用)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六月

目 录

一、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1)
(一) 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鼓吹 “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	(1)
(二) 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4)
(三) 胡说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 阶级关系的变化.....	(6)
二、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10)
(一) 篡改继续革命的性质.....	(10)
(二) 篡改继续革命的对象.....	(12)
(三) 篡改继续革命的动力.....	(19)
(四) 篡改继续革命的任务.....	(26)
三、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31)
(一) 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叫嚷要“彻底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31)
(二) 反军乱军，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39)
(三) 伪造“全面专政”论，妄图实行法西斯专政.....	(45)
四、篡改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50)
(一) 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用“张春桥思想” 代替党的指导思想.....	(50)

(二) 篡夺党的任务，推行反革命策略.....	(53)
(三) 践踏党的章程，推行帮派组织路线.....	(57)
(四) 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60)
五、推行反革命策略，阴谋篡党夺权.....	(62)
(一) 玩弄反革命权术，施展政治欺骗.....	(62)
(二) 鼓吹“矛头向上”，大闹党中央.....	(64)
(三) 煽动“全面内战”，分裂革命队伍.....	(65)
(四) 妄图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67)

“四人帮”篡改科学社会主义的言论摘编

一、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一) 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张春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上的旁批。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第86页

我最近也在重读（《毛选》），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

张春桥1976年9月12日在朱永嘉信上的批语

我们过去总是从这一方面，说有些同志习惯（算习惯势力）到一个地方，先看党、团员，看老工人多，一看，这个组织好、纯。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党一再讲了以后，还老改不过来呢！

张春桥1967年6月8日在驻沪三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 以下简称《材料之三》。

我觉得，还是要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只有从这里才能看出你们所说的规律。这里需要具体地研究一九六六年（以及以后）的阶级关系。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讲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张春桥1975年12月10日给朱永嘉、陈寅德的信

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看将来，并考虑我们的政策，（弄清楚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也有必要。请你们试试看。不是“三打祝家庄”，只要有阶级，就要研究阶级关系，直到消灭阶级。……搞社会主义革命，事情很多，抓阶级斗争，事情也很多。但是对每个时期的阶级关系不作系统的研究，还是提不起纲来，或者在政策上处置不当，犯大错误。

张春桥1976年8月12日在朱永嘉信上的批语

告朱永嘉，作阶级关系调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实际生活中阶级关系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搞不清楚。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很想作点调查。

张春桥1976年5月同陈寅德的一次谈话

还有一个问题提请大家注意，我们的阶级划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政治立场问题，政治态度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
- 张春桥从一九七三年起，几次三番下令要搞工人队伍调查、阶级关系调查。一九七六年五月的黑指示下达后，朱永嘉马上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班子”，并写信给张春桥，表示前两回由于没有领会他的精神，没有搞清楚“盘陀路”，结果没有成功；这回决心“三打祝家庄”，搞好这个调查。

究竟怎么看？放到一个什么地位？因为你们也没有讲这个问题。究竟解放二十年了，他政治上的表现，在划分阶级和阶层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掌握？

姚文元1969年6月4日在关于小业主和资本家的情况和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任何一个政治事件都使阶级关系起变化的”。“肃反、反右使阶级关系变化了，文化大革命使阶级关系变化了，天安门事件也使阶级关系起了变化。天安门事件前后难道阶级关系没有变吗？我看是变了，要研究天安门事件前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转引自：

朱永嘉的黑话。引自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揭发材料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叫嚷“我们要从理论上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说：“合作化时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是三、四百元一幢楼，汽车警卫样样有。”

转引自《搞乱理论是为了篡党夺权》，1977年8月28日《辽宁日报》

我们现在看阶级斗争，划分阶级，不是单纯看占有不占有土地、支配不支配整个财富利润，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看。

毛远新1970年6月5日在辽宁省整党建党学习班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看人不看户口本了，现在犯罪挨押

的净是贫下中农。

毛远新1975年1月在辽宁彰武县的讲话

(二) 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如果写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讲了，再讲没有意思了；……你说它错吗，不错。但等于不讲，等于说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一样。

王知常1976年7月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党史组谈炮制《要重视当前阶级关系变化》一文时的讲话

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化为走资派，这是最危险的敌人，实际上是敌我矛盾。

徐景贤1976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的一次讲话。

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

姚文元加在197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的一段话

我们不要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就没有孔老二了，就没有“儒”了，就没有路线斗争了。从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看，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为什么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先锋队内，还有孔老二出现，这个道理得认真深思一

毛远新1974年7月7日在辽宁省委批林批孔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

江青1974年6月19日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五四以来，尊孔与反孔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四人帮”控制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 王知常
1969年10月的一次讲话

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

张春桥1975年8月写的文件稿。引自《材料之三》第30页

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好。

张春桥1975年8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讲了春桥××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

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迟群传达的江青1975年4月4日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31页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引自《材料之一》第32页

还有一个所谓经验问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经验。但是，是什么经验，要作阶级分析。他们的经验就是复辟倒退的经验，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对现在没什么现实意义，还给自己贴一点金。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一套经验不行了！

迟群1974年7月在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3页

（三）胡说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很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革谈不上。

颠覆政权的不是荣（毅仁），当然荣也想搞，但代表新老（资

• 以下简称《材料之一》

产阶级)的是党内走资派。

张春桥1975年11月、1976年1月同黄涛的两次密谈。引自徐景贤听黄涛传达张春桥谈话时的记录，引自《材料之三》第4页

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要把夺取政权的问题强调出来。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政权在敌人手里，在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手里，当时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你们讲是“附庸”和“工具”，还是讲代理人好。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究竟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同党内资产阶级实际上就在斗了，高岗、彭德怀，点了名的都是……。三反、五反时党外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你们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讲我们既反对了党外资产阶级，又反对了党内的资产阶级，不如倒过来讲，更能反映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反对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才能更有力地反对党外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姚文元1976年5月13日给原《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电话

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些人(注：指黄维等)，而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

姚文元1976年9月16日的日记。引自《材料之三》第11页

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

张春桥1976年8月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党内确实有个资产阶级。

姚文元的黑批示。引自《材料之三》第56页

中央出修正主义是很危险的，而要中央不出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决定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是长期的现象，一下消失不了，党内资产阶级存在一天，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就会存在，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头目，不但有司令部，而且会有总司令，有他们的路线、纲领和社会基础，有他们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具体步骤。

朱克家1976年5月20日在昆明钢铁厂共青团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资产阶级中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出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197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我国国内阶级关系的一个新变动。这个变动，是以阶级斗争已经进入到反修斗争为主要标志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新阶段相适应的。

来源* 1976年2月的大字报《谁是刽子手？》

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变化密切联系的。

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1976年第6期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是无

* 来源是朱克家在云南讲演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笔名。

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新形式的集中表现。

康正允：《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第35页

在旧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这种地位已由党内资产阶级取而代之。

康立：《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1976年第7期《学习与批判》

党内资产阶级、军内资产阶级是一个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张铁生1976年8月13日在沈阳军区某部二营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35页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内走资派已成为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和核心，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四人帮”及其公安部的党羽炮制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引自《材料之三》第19页

共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而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阶级、历史、思想根源的。

迟群、谢静宜1976年8月26日的一个“汇报提纲”

走资派之所以是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是因为

他们代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1976年
第6期

二、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一）篡改继续革命的性质

“四人帮”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矛盾变了，对象也变了”。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变为“造反派同走资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转引自《打倒‘闹而优则仕’》，1977年2月27日《解放日报》

当前主要矛盾，是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

王洪文1972年5月在杭州同翁森鹤的一次谈话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老干部，解决老干部的问题，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

张春桥1967年4月的一次讲话

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做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好机会。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马天水1976年11月5日的揭发交代材料

这些运动要根据林彪××讲的，拔一批、罢一批。

张春桥1967年3月1日的讲话

这次文化大革命等于第二次进城，原来的机关干部除了造反派以外，相当于旧人员、留用人员，旧机构要砸烂，这些人员大部分要下去，要从基层选拔一批造反派上来。

张春桥1967年2月初在上海参加讨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草稿时的讲话

现在老干部大部分是代表旧事物的，能打倒(就)打倒，不能打倒(就)打跑，打不跑(就)打病打伤。

迟群1976年8月下旬对太原铁路局一反革命分子的谈话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重要的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程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红旗》1976年第10期

文化大革命是焚书，这次批林批孔是坑儒。我们现在不坑儒，他们就要坑法。

翁森鹤1974年1月在杭州屏风山的一次讲话

党内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要不然，为什么反孔批林？

江青1974年6月10日在天津批林批孔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反对经验主义指的是“从中央政治局起，到地方上的高级干部”。

转引自《“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狼子野心》，1976年12月20日《河南日报》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9月版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也是暴力革命，今后的斗争看来也是暴力解决问题。

姚文元1976年5月5日同陈冀德的谈话

（二）篡改继续革命的对象

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江青的一次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1页

王洪文说：“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还不就是当时的那些民主派。”

肖木的揭发交代。引自《材料之三》第11页

任何经验都有社（会性）、实践性，我们要的经验是社（会主）

义革命经验、文革经验、与走资派斗争的经验。他可以大讲万里长征、抗战、打蒋家王朝，他在某种意义上为走资派抹金，把民主派当成社（会主）义英雄。他们这些民主派在社（会主）义成了走资派，也是规律。

迟群1976年5月5日在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3页

迟群一伙恶毒地攻击党的老干部是“解放前的民主派，十七年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革命后的翻案派”。

转引自《从清华大学斗争历史看“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197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迟群1976年在清华大学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3页

老干部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的黑话。引自1976年12月6日《辽宁日报》

现在从中央各部到省、市地方，掌权的大部分是民主派。

马天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引自上海市委组织部王日初的揭发交代

经过民主革命的人，至少五十多岁。现在掌大权的大多数人，是经过民主革命的，如中央各部、各省市，再下地委，也是掌握在

这些人手中。……这部分人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两种态度，轻则不满，重则反对。

马天水1976年8月2日在上海市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就是今天的走资派。

肖木1976年5月14日在《朝霞》编辑部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还在走，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路线不清跟着走，明知不对硬着头皮走，思想合拍顺顺溜溜走，总之，党内领着党外走，下头跟着上头走。

李伯秋1976年7月在辽宁省财贸会议上的讲话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吗？

池恒：《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1976年第8期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

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 池恒：《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1976年第8期

关于“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一公式和“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规律。”这样的公式和内容是从“四人帮”那里来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远新都说过，时间大体是在七六年三、四月间。

—— 王洪文1977年6月5日的交代。引自《材料之三》第12页

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

—— 张春桥1976年2月23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向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那么我们党呢？是不是会出资产阶级？我们一些党员、高级领导干部，官做大了，房子住好了，有汽车，还有服务员，恐怕连资本家还没有这么神气过。过去资本家坐汽车要拿钱买啊，我们的公家发，过去资本家坐汽车，司机要雇，我们呢，是公家配。所以，有的党员干部作了大官，就不愿革命了，他维护大官这些人的利益，去压迫工人，去压迫农民，去压迫战士，结果他就成了党内新的资产阶级。

—— 毛远新1976年2月8日的谈话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走资派就

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

池恒：《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1976年第5期

走资派就是党内的右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

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1976年第6期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捏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形态”，是“整个资产阶级走向灭亡阶段出现的最后一种形态”的荒谬理论，诬蔑老干部在我们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胡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转引自《“四人帮”篡党夺权急先锋的十大罪状》，1977年11月25日《文汇报》

“四人帮”宣扬：“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引自《材料之三》第2页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公开叫喊，斗争重点“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二把手”。胡说什么“大老爷在国家，二老爷在省，三老爷在市”，诬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权都落到了走资派手里。

转引自《不许篡改走资派的阶级内容》，1976年12月26日《解放军报》

“四人帮”在清华的那个黑干将……声称：“走资派就是最大的反革命”，“走资派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转引自《怒火满腔深揭狠批反革命“四人帮”》，1977年
1月30日《北京日报》

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池恒：《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红旗》1976年第7期

承认不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承认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根本标志。

延风：《〈二十条〉的要害在哪里》，《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

党内资产阶级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

程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红旗》1976年
年第8期

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等级制，这些东西，动一动阻力就很大，还没有提出限制大官们的利益呢！还没有实际限制，只是批一下，要自觉限制，阻力就那么大。我接到信说有一种论调，老革命就该拿那么多钱，还要增加，打江山时，你们干什么，在哪里？用阶级观点分析，江山打下来就不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为自己了。

还有什么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呢？这代表某一阶级阶层。

姚文元1976年4月24日对原《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他们所以那样有恃无恐，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法宝在身，有一个红色护身盔甲——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老功臣，冒着革命的金光，使人生畏，不易识破，他们很有市场，说话大家相信，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关系，它极其严重地威胁着党的生存和国家的命运，……走资派代表着一切旧社会的社会关系，他身后站着一个小队的队伍，人家有路线，有政党，有司令部，还有司令哪！

宗明兰1976年8月1日在辽宁省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关中的这种资产阶级政权的积习，就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恶习。由于无产阶级政权同时又是统一领导和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政权，因而这个政权的官僚主义恶习往往又是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那么，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恶习就是在这块土壤上产生的培育党内资产阶级的气候，……

秦正先：《谈谈党内资产阶级》

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反对限制资

产阶级法权。

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1976年第6期

（三）篡改继续革命的动力

我感觉有些说法有些乱了。依靠整个工人阶级，好象工人内部没有矛盾了。那就不合辩证法了。

张春桥1974年10月14日的谈话。引自《材料之三》第86页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左派”。

张春桥的一次谈话记录。引自《材料之三》第86页

张春桥说：“工人象算盘珠一样，只能拨一拨，动一动”。

转引自《光辉的文献 锐利的武器》，1977年1月19日《河北日报》

我们工人自己也有弱点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如农民呢，一个农民的生产，是全过程的。一个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工种，有的前道或者后道工序就不知道了，有的早班晚班也不联系。这是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的。看不到全局。

张春桥1975年1月9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引自《材料之三》第87页

张春桥说：“王进喜是站在保守势力一边的。这些劳动模范有

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另外，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保自己的荣誉，对继续革命就想得少了。”

原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的揭发交代。引自《材料之三》第88页

朱永嘉、王知常秉承“四人帮”黑旨意，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上，污蔑和分裂工人阶级，把工人队伍分成四部分，胡说什么：第一部分是老工人，他们“有的解放前就当包工头的，有的是技术工人，工资很高，革命到顶了。也有很好的老工人，受苦深。他们也有短处，地位变化了，生活条件变化了，继续革命觉悟差了。”第二部分是，“解放前后当艺徒，‘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对党有感情，现在是工厂里的主要骨干。他们的问题是物质刺激的多，受苏修的一套影响多。动不动要搞管、卡、压，动不动要搞物质刺激那一套。”第三部分是，“五八年前后进厂的，这些人吃修正主义的桃子不多，不少人还是临时工，吃过修正主义路线的苦。六六年起来造反，路线觉悟高，造反精神足，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问题是党的观念少一些，劳动关没有完全解决。什么事可干，什么事不可干也弄不懂。有些人造反有私心杂念，掌权后老是倒退，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新的流氓无产阶级，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用过这种人，蒋介石也靠这些人。这些人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基础”。第四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六八年进厂的新工人，他们热情，单纯，学习努力，反应快，斗争经验很少，幼稚，没经过锻炼。”

原上海写作组王复初同志的揭发材料。引自《材料之三》第90页

朱克家等人胡说：“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是保守势力”，“贫下中农土改时分了胜利果实，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要求了，没有革命性了”。

转引自《坚定地执行党的阶级路线》，1977年7月11日《云南日报》

张春桥：“农民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

张春桥女儿张维维的揭发。引自《材料之三》第89页

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对立是天然的。

张春桥1969年10月17日在《海港》剧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将来真正闹事是这些知识分子，要搞复辟的就是这些人。

张春桥1969年8月25日在讨论有关落实资本家、小业主政策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还没有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观好的知识分子。

张春桥1970年12月在上海党代会大学组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91页

我们骂臭知识分子，是因为那些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他炫耀他的知识，他以为他有资本，可以和无产阶级对抗，他用这一套东西来吓唬工人、农民，因此我们就骂。什么知识分子？臭

知识分子！我看这个应该骂。

张春桥1971年1月15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传达第四次党代会精神的讲话

姚文元把知识分子斥为“独立王国公民”，把知识分子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分子”。

转引自《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1977年8月6日《文汇报》

知识分子既不参加阶级斗争，又不参加生产斗争，念几天书之后，“学而优则仕”。这个“仕”是什么东西，象棋老“帅”旁边是两个“仕”，专门保老“帅”的，“仕”是保皇派。

李伯秋1974年7月在辽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批林批孔讲习会上的讲话

讲到教育阵地，教师都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教授，以后靠他们才逐步培养了新的，但也是按照他们的思想体系培养的，“基本照旧”，除了不喊蒋委员长万岁外，也差不多。

迟群、谢静宜1976年5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座谈会上讲话的记录。引自《材料之三》第172页

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人（注：指教师队伍）可以这么估计他们，不说是哪个社会，不说是哪个国家，不论是哪个阶级掌权，他们都可以凭着那点知识、本钱混饭吃。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

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这可没准。假如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话，恐怕他比现在还高兴，比现在搞教育革命还适应，比现在还吃香、卖力，挣钱还得多，这个恐怕是事实吧！我那么想，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变了天了，他们就不可能再喊毛主席万岁，也不再喊共产党万岁了。他们要喊谁万岁？咱就不知道了，恐怕谁统治中国他就喊谁万岁，这有什么办法？世界观决定的。

张铁生1976年1月28日在北大的讲话。引自《轶闻之三》第91页

什么叫教唆犯？你老师就是教唆犯。……如果说是教唆犯，你们学校是最大的教唆犯。

毛远新1974年2月19日在鞍山市十三中座谈会上的讲话

知识分子按其本性来讲，那是很难改造的。

朱永嘉1976年初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讲话

文史馆、参事室、民主党派都是牛鬼蛇神。

张春桥1967年的一次讲话

民族资产阶级有什么两面性，我看只有反动性。中央统战部在理论上的错误，是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把社会主义的敌人当做朋友，把专政对象当做团结对象，不分敌我，认贼作父。

毛远新在辽宁省统战部办公室一个亲信的黑话

人大、政协不要了。

张春桥手稿

资产阶级完蛋了，统战工作臭了，还搞什么统战机构？！

王洪文在研究成立统战机构时的谈话

张春桥：造反派“代表新生力量，代表前进方向的力量，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大部分共产党员是没有朝气的“中间派”，他们“没有完全反对党，但在这次斗争中也没有冲锋陷阵，失去了先锋队的的作用”。

转引自《一面反党的黑旗》，1977年7月5日《解放日报》

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靠革命造反派，就交给我们了。我们把队伍带好，今后总得管十几年吧！

张春桥1967年9月11日的一次谈话

有事要多同（上海）总工会的一些老头头（注：指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商量，多做他们（的）工作，多依靠他们。

王洪文1972年9月对王秀珍的谈话

闹派性、搞武斗的人，倒有点反潮流的精神，我倒喜欢用这样的人。生产好的人，往往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路线斗争觉悟不高。

王洪文1973年9月19日在上海市常委会上的讲话

我想这样的青年（指打群架的流氓阿飞）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

张春桥1972年11月21日在关于召开上海市第六次团代会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不要看他们（注：指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有这样那样缺点，今后如有风吹草动，真的能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的，还是这些人。

王洪文1973年8月15日在钓鱼台对王秀珍等人的谈话

（朱克家等人胡说）：“地、富出身的被压了二十多年，反对走资派，造反精神最强”，公开提出“宁可用站合队的地主富农，也不用站错队的贫下中农”，“杀过人、抢过人的也不要紧，只要敢起来造反，就是革命的”。

转引自《坚定地执行党的阶级路线》，1977年7月11日
《云南日报》

“打开监狱找左派”，“放左派”。

江青的黑话。转引自《“四人帮”要调动的是一切反革命因素》，197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打开牢门解放造反派”，“踏破铁笼找战友”。

“四人帮”在福建的帮派于1976年提出的反动口号

(四) 篡改继续革命的任务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得把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国民经济也搞不上去，或者一时搞上去了，最后还是又下来。

张春桥1975年12月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同黄涛的谈话

张春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唯生产力论”，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

转引自《红旗》1977年第4期

1976年9月，江青第二次窜到大寨。她在九月五日下午的一次会上，肆意否定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明目张胆地造谣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纯粹是造谣，那是造谣公司董事长造出来的。

大寨大队郭风莲等同志的揭发，引自《材料之三》第175页

江青胡说：“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是修正主义。

转引自《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1976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世界一切国家都这样提的。没有一个国家不讲搞上去。这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

马天水1976年8月5日在上海机床厂党委办公室的谈话。

引自《材料之三》第178页

“四人帮”的两个心腹对于毛主席关于“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指示，他们心怀鬼胎，造谣说：“这不是毛主席的指示”，肆意污蔑为“唯生产力论”。对于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他们竟然攻击说：“在一抓三促的口号下，人们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如何识别走资派呢？”

转引自《砸烂“四人帮”的独立王国》，1978年12月4日
《北京日报》

现在有些新动向，地震发生后有人要抓生产了，抓救灾了，不抓阶级斗争了。要抓上层建筑，不要忙于生产。

姚文元1976年8月2日对原《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引诱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姚文元审定修改的陆放、任明的反党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引自《材料之三》第176页

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着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姚文元1976年4月26日在《红旗》杂志社的一次谈话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这实

实际上是△△△的“唯生产力论”，搞复辟资本主义。

毛远新1976年2月8日的一次谈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78页

“唯生产力论”是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那种接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攻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种种奇谈怪论，不正是“唯生产力论”在新条件下的翻版吗？

梁效：《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976年2月12日
《北京日报》

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人民日报》1976年2月6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引自《材料之三》第198页

即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也是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

陈绍昆1976年4月在冶金部党的核心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他们之所以要在四个现代化和教育革命上大做文章，其险恶的用心就是要利用人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来腐蚀人们的灵魂，引诱人们离开无产阶级单纯地去发展经济，这只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打掩护。

方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

所谓“四个现代化”，其源盖出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字号药铺。

把“四个现代化”吹得震天响，似乎很有点“实业救国”的气味，其实却是十足的投降卖国。倘若服这帖毒剂，那么，我国的自然资源将“化”为帝国主义的廉价原料，国家主权将“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所有制将“化”成官僚买办所有制，半殖民地的苦难生活又将重现。

《文汇报》1976年7月17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引自《材料之三》第198页

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物质我就不管了。

张春桥1976年2月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谈话

团结起来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更大的胜利。更大的胜利是什么？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你可以放十个卫星，但是如果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你放一百个卫星也没有用。

张春桥1976年12月7日在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决议起草小组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八亿人民主要是抓上层建筑”，生产“颗粒无收也没关系”！

转引自《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1976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

张春桥：“不要怕降低生产速度，下降也可以”，“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转引自《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1976年12月28日《湖南日报》

文化大革命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主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

姚文元1974年4月6日对原《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王洪文：“这几年我们没有抓生产，生产照样上去了。”

引自王一平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四人帮”及马天水经常散布“经济工作不要抓，企业管理不要抓，只要搞搞大批判，生产自然而然可以上去”。

转引自上海市计划组揭发，计委编《“四人帮”在经济领域的反动谬论》

毛远新说：“一敏一饒不用动，路线解决了，生产就上去了。”

转引自《省直机关干部、群众两万多人集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辽宁那个死党的反革命罪行》，1976年12月12日《辽宁日报》

马天水1971年后多次对上海机床厂干部说：“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完不成任务也是伟大的胜利。”又说：“生产上去了，路线不

对头，要批评。只要路线对头，即使生产上不去也要表扬”。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

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在1975年11月8日的一次谈话

你们沪东厂把技术权威赶走，生产会搞得更好。

王洪文1970年5月22日在沪东造船厂领导、部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代表会上的讲话

张铁生诬蔑大寨党支部和昔阳县各级党组织是“生产党”、“粮食党”。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昔阳县李喜慎同志揭发

三、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一）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叫嚷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资产阶级专政是客观发展的事实，确实是这样，资产阶级专政，地富反坏右专了我们的政。这情况不仅是电影局，那个单

位都一样，查好了。

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在上海文艺、出版、电影、新闻等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的阵地十七年内一天也没有占领过，不要讲十七年，就是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前也没有占领过。至于有的共产党员个人在这条战线中，工作做得好一些，这是另一回事。要看权究竟在谁的手里。

张春桥1970年12月23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文艺组会议上的讲话

还是十七年与五十天的老问题……你们争论这个题目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争论红线还是黑线，不会就事论事的。……提这个问题的人，总想把这一段说得好一些，他就光采了。

不算“彻头彻尾”，算百分之九十九好了。

张春桥1970年12月23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文艺组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一些基层，根本不是部分，而是全部权力就不在我们手里，有的过去从来没有拿到过手里。

张春桥1971年1月4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上的政治报告

上海基层单位领导权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的）究竟有多少？……生产资料，好象在我们手里，实际上还是

在资产阶级、国民党、走资派手里。领导权的问题究竟解决了多少？有的解决了还会有反复。

张春桥1970年12月7日在讨论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决议会议上的讲话

搞了二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上海工人真正掌握上海的局势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工宣队派出来以后。

张春桥1969年8月17日在上海一次学习讲习会上的讲话

解放后就搞社会主义革命，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这次（注：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

张春桥1968年1月1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十七年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十七年可以一分为二，只能象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样一分为二”，“十七年路线错了，一切全错”，“要和十七年对着干”。

迟群的黑话。引自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林克1977年12月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江青1975年9月17日在大寨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66页

（“四人帮”在内蒙的走卒）狂妄叫嚣要“重新理解社会主义

社会”，要“提出新理论”，并用以“解剖我们现代的社会”。……他们胡说我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没有拓通”，时至今日，“无产阶级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谩骂我国……是“官僚特权机构”，“国家就是少数国家官吏占有着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国家就是这个集体私有者集团的代表”。

转引自《“四人帮”走卒的狂吠》，1977年1月15日《内蒙古日报》

江青：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些官僚机构”，“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必须彻底砸烂”。

转引自《努力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7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

工厂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还没有多少。

上海过去都是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办事，现在要按毛泽东思想改变过来。

张春桥1966年11月12日在“安亭事件”中对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讲话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校是资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专政已好多年了，现在是无产阶级推翻你们的政权，把政权夺回来的问题。

张春桥1966年5月在上海市委常委（扩大）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公安部队、监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来了，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官僚机构。

江青1966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谈话

江青恶毒攻击公安机关“解放后一直是黑线统治着”，“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

转引自《坚持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 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197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王洪文：“公安机关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转引自《“四人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1977年1月17日《江西日报》

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公安机关内部安插和发展了一批坏人。在这一小撮坏人操纵下，有些方面，有些单位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妄图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王洪文1972年春在上海市公安局各处、分局、县局负责人和联络员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市公检法这条战线，从解放到现在……一直对抗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

张春桥1967年12月19日在军宣队进驻上海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人，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黑干将的黑话。转引自1977年1月22日《光明日报》

文化大革命前是有教训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了破坏的作用。

迟群1974年12月23日在学习朝农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的讲话记录。引自《材料之三》第91页

十七年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培养的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远新在辽宁省高级知识分子批修整风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子。你那个教育也不过是

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教育，你还有多少可吹的。

毛远新1976年6月2日、5日的谈话

王洪文还说什么在科研机构中，“特务象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

转引自《要知松高洁 待到雷化时》，197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总根子是辨帅这一点似乎还可以考虑。辫子党的头子应是那个被废除了的皇帝吧？应是整个制度吧？

张春桥1976年8月13日在朱永嘉信上的批语。引自《材料之三》

姚文元：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转引自《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1977年1月10日《浙江日报》

要搞一个巴黎公社，彻底“砸烂旧机器”。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上海市委组织部揭发材料

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对马天水的一次谈话。引自马天水1976年11月5日的揭发交代

张春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俗话说：‘长

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应把‘换’字改成‘撵’字，旧人不去，就要撵。”

转引自《“四人帮”全面篡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一）》，
1977年3月26日《黑龙江日报》

今天到会的全是造反派头头，到会的没有旧市委、旧人委的人，只（徐）景贤一人，真是有改朝换代的样子了。是要改朝换代呀！那些走资派还让他们再回来吗？

张春桥1967年9月关于武斗问题的一次讲话

江青：“彻底砸烂公检法”。政法机关“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

转引自《坚决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伟大号召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1976年12月18日《四川日报》

（浙江公安厅）他们对我每走一步，都要盯梢，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坏。（叶群高呼：要砸烂公检法！）你们的材料我看了一些。打倒反动的公检法！

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的反动公检法！

江青1968年3月18日对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现在我再一次郑重提出，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揭开，……这个公检法不把盖子彻底揭开，害苦人了，它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

江青1968年2月21日对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公安机关不是掺沙子，而是要换土。……要下定决心把公检法砸烂。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王翰国1968年11月24日在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党委会上的传达

我们的有些同志对公安处很迷信，讲句难听的话，那就是特务机关。这个问题，路局革委会也好，分局革委会也好，没有引起重视，对公安局旧的公检法，还是要砸烂，而不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还是采取改良主义的，而不是彻底把旧的机构砸烂，用毛泽东思想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王洪文1968年7月28日在研究铁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砸烂”的岂止公检法呢？我们各级党委都是“砸烂”了嘛！……东北局、省委不也“砸烂”了吗？你公检法不过是省委的一个部门，为什么就不可以砸？

毛远新1973年11月25日在辽宁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反军乱军，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王洪文1975年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的一次私下谈话

什么解放军，都是老保！

王洪文1968年春节在张春桥家里设的“私人宴会”上的讲话

王洪文：“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

姚文元：“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

转引自《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以上海为阵地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1976年12月25日《解放日报》

张春桥：“军队是老家伙治军”，“越老越反动”。

转引自《革命老干部治军好得很》，1977年1月20日《解放军报》

张春桥：“冲击解放军是真正拥军。”

转引自《“四人帮”乱党篡军，破坏民兵建设罪责难逃》，1976年12月11日《吉林日报》

江青：“我就是耍整整军队。”

转引自《毁我长城者必亡》，1976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

听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吧，八一造孽了，军伐（阎）管你们。

春桥××，看来要夺权，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去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

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

江青1974年3月5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时的谈话。引自《材料之一》第9页

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如果真象来

信者所说那样，^{张春桥}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

（张春桥批：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

江青1974年2月25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引自《材料之一》第11页

王洪文：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转引自《玩火者必自焚》，1976年12月14日《解放军报》

后勤问题看来得点火，如何做法待议后再定。

江青1974年2月23日对总后卫生部 and 后勤学院三人来信的批语。引自《材料之一》第10页

^{张春桥}海军问题得研究一下，空军也冷下来了，捂盖子、反（翻）案，不解决不行了。

江青1974年2月23日在一封来信上的批语。引自《材料之一》第10页

批林批孔军队也不开展起来了，是我批了铁道兵的一封信，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总政也在动了。我现在到处放火，把军队批林批孔搞起来。

王洪文1974年8月的一次私下谈话

如果苏修、美帝真的打来，我怀疑作战部会有“维持会”。真的

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

王洪文1974年8月15日在总参作战部汇报时的讲话。引自
《材料之三》第25页

靠现有部队，对付苏修发动的侵略能行吗？根本不行。真正打起仗来，野战军不知藏到那个山沟里去了。

毛远新1974年11月20日在辽、吉、黑三省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要揪“军内资产阶级”。

转引自《四个“片会”一个阴谋》，1977年1月29日《解放军报》

“四人帮”大肆鼓吹要层层抓“军内资产阶级”，揪“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走资派”，叫嚣要改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军队。”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张之培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

党内的资产阶级呀，在部队尤其厉害。

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咱部队是什么态度？也去执行嘛，如果抵制的话，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跟着走、顺着干的话性质就变了，雇佣军或者是一个御用军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张铁生1976年8月13日在沈阳军区某部二营的讲话。引自
《材料之三》第35页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说“我们这个军队我看现在也不是那么太好了”。“军队里也有纳吉的社会基础”。“部队的问题严重”，“现在部队教育还是民主革命教育”。

转引自《铁岭地区召开地、县机关干部广播批判大会》，
1976年11月28日《辽宁日报》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民兵工作脱离现实阶级斗争，民兵组织有名无实”，“都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民兵在群众中威信不高。”“组织形式不解决不行”。“要打破军事一条线”。

转引自《同仇敌忾大揭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1976
年11月21日《大众日报》

王洪文：“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搞起来的。”“把我们的民兵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问题”，“这个队伍不要让人家指挥”。

转引自《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1976
年11月28日《湖南日报》

战争问题主要是把上海民兵搞好，你军队有多少？死守上海要靠上海民兵。……平时不把民兵工作搞好，战时光靠你那点部队就行啦？今后打仗，主要靠民兵。

张春桥1973年8月的一次讲话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民兵指挥部于1976年炮制的对民兵“宣传材料”。引自《材料之三》第35页

王洪文：“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一支以‘文攻武卫’为基础的人民武装”。“民兵可以管部队”。

转引自《愤怒揭发控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1976年11月11日《湖南日报》

王洪文：“我们文攻武卫队伍的建设，应该把它提到彻底改造民兵，……最根本的任务，首先是改造民兵”。

转引自《篡党夺权的一大罪证》，1977年1月26日《广厦日报》

民兵不要了，文攻武卫搞好了，就可以代替民兵。

王洪文1968年1月10日在上海工总司长宁区指挥部的一次谈话

工人武装制止武斗比解放军好。解放军有个“四不”，讲话也受限制。一武斗他们戴上一顶柳条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吗，我也是；你是群众吗，我也是；你辩论，我就同你辩；你打我，我也能

打。看样子我们这个队伍比民兵好，因为都是造反派，是在阶级斗争中建立的。原来有的民兵是在和平环境中建立的。

张春桥1968年8月24日在接见江西省革委会赴沪学习团时的谈话

（三）伪造“全面专政”论，妄图实行法西斯专政

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采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

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
年第4期

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
第4期

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

* 列宁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样的话。张春桥在引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段话中，竟然插进了他自己伪造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样的话。

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列宁仅仅说过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张春桥在写这篇文章（注：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时候，认为列宁的说法还不够，他认为只有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因为怕人家看了，会认为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才没有把这句话写上。

肖木1975年4月10日在上海写作组的一次谈话

同新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并逐步铲除产生它的土壤，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林彪》，《红旗》1975年第5期

专政不仅是对敌对阶级，而且也包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至改造我们自己在内。

沈恒汉1975年5月23日在甘肃省委理论学习班上的讲话

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
杀人。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材料之一》第103页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1976年4月3日日记。引自《材料之一》第193页

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生长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要抓几个人、枪毙几个人才解恨。

镇反始终未触及到文教战线。应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

张春桥1970年1月14日在上海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到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不了什么！

王洪文1976年8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1977年1月8日《人民日报》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越来越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我们公安机关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不仅要注意社会上老的阶级敌人，而且更要看到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就要求我们公安机关在同反革命分子

作斗争时，注意他们同党内走资派之间的联系，重视深挖他们的后台，发现重要线索，及时报告党委。对走资派的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打击。

“四人帮”及其公安部的党羽炮制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引自《材料之三》第19页

反党分子江青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吃掉老帅”！

转引自《掀起揭批“四人帮”反党乱军和破坏军事科研群行的怒潮》，1977年2月5日《天津日报》

在讨论《反击》剧本时，他（迟群）又恶狠狠地说：“走资派也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来，判刑，还可以枪毙他几个。”

转引自《“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1976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姚文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

转引自《打击知识分子的一根大棒》，1977年7月15日《解放日报》

改造教师就象在水中按皮球。压一压，压下去了，一松手又会浮上来。

徐景贤1970年在上海市大、中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知识分子怎么看？复旦大学要大大吐故一批，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出党。

姚文元1969年5月16日在上海市新闻界负责人和写作组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叫嚷：“将来能同我们较量的，就是那些知识分子。”

转引自《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1977年8月5日
《文汇报》

四、篡改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用“张春桥思想”代替党的指导思想

（马列著作）这些东西有一个作用，跟原子弹、氢弹一样，吓唬人。

张春桥1972年1月12日在听取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汇报业务工作时的讲话

张春桥说：“马恩的有些话也有问题”，“列宁的说法是不够的”，毛主席著作“也不是句句精彩”。他甚至向一个心腹透露，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⁴¹⁷

转引自《捣乱和失败的记录》，1977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江青：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大部分内容是今天不适应的。

转引自《不是左派是右派》，1976年11月21日《湖北日报》

张春桥说，这本著作（《论十大关系》）“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要砍掉。”

转引自《“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1977年4月21日
《文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正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毛主席的逝世而万分悲痛地举行追悼大会的一天，张春桥恶毒地攻击说：“现在出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也疯狂地咒骂：“五卷里面的文章是建国初期写的，搞的都是苏联的一套。现在出，真是左派丧气右派笑。”

转引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历史研究》1977年第8期

“活学活用”，总不能算错吧。……“急用先学，立杆见影”有时也会有的。如要写批苏修的文章，就去查列宁批沙皇的话，查来就可用上了，这不是“急用先学，立杆见影”？

张春桥1972年10月4日在上海市有关组、办和驻沪三军政治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的余党胡说什么“张春桥思想”是由“现阶段阶级

关系的新变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人民公社生产队所有制的过渡”三个部分组成。并把它无耻地吹捧成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第四个里程碑”。

转引自《抓住篡党夺权这个要害深揭狠批“四人帮”》，1976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陈阿大竭力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吹喇叭、抬轿子。他经常肉麻地吹捧张春桥，说什么“春桥讲的话，含意深，我们要多想”；甚至狗胆包天地胡说什么“学好春桥的讲话，可以代替学毛选”。

转引自《“四人帮”的凶恶魔犬——陈阿大》，1977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

《宣言》（注：指上海《前进农场宣言》）是有来头的，有好多话不是我们能说的。如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问题，是体现了“张春桥思想”的。

朱永嘉1974年9月13日在上海前进农场的讲话

张春桥这篇文章（注：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明确地从“四个一切”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第一次，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

肖木1975年4月12日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次讲话

(二) 篡改党的性质，取消党的领导

姚文元：要搞另外一个类型的党。

转引自《一面反党的黑旗》，1977年7月6日《解放日报》

王洪文：靠派不靠党。

转引自《王洪文多次窜到浙江搞了些什么鬼名堂？》，1976年12月4日《浙江日报》

现在，党组织不能恢复，又不能依靠，还得去改造它。

张春桥1967年8月8日接见山西省太原市代表时的讲话

……最近我老想党的问题，怎么办？几十年的党如何改造，联想到我们的阶级、我们的队伍怎么样改造？

张春桥1967年11月22日在研究召开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时的讲话

旧市委这个组织不行，现在提整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联共党是多次重建。每一次阶级斗争过后，就搞一次清党，清党是从苏联来的。毛主席提整党，从思想上整，实际上也是清党。……过去我们讲，有一些实在不象党员，但是没时间搞掉他。这次运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要相当大部分改造，有的是重建。

张春桥1968年1月15日在华东师大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

张春桥1968年1月15日在华东师大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叫造反队也可以。

转引自《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1977年7月2日《人民日报》

造反队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不要原来那个党支部了，让造反队来起党支部的作用。

张春桥1968年在上海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

哪里党组织的机器还在转动，哪里形势就不好！

搞垮一个厂子，就是在省委书记脖子上套上一条绞索。

王洪文在浙江的一次讲话。转引自《挖掉祸根，形势巨变》，1976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形势好不好，要有个标志：凡是党委机器不转的地方，就是形势大好。凡是党委还在实行领导的地方，党委机器还在转的地方，就是形势不好。只要党委的机器还在转的地方，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砸烂他的机器，使他不转动。

翁森鹤1974年2月20日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讲话

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精简。

张春桥1967年5月的谈话。引自徐景贤的记录

文化大革命时，县委不起作用，生产搞得也不错嘛！

王洪文1976年2月25日晚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我建议（四川）大足厂的群众踢开领导班子自己闹革命，组织成新的领导班子。

王洪文1972年12月29日在一份文件上的批语

你看嘛：你们的旧党委垮台快三年了吧？这三年过得不是蛮好吗？可以不可以不要党委呢？

.....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在中央，在毛主席，何必要这个党委呢？

.....

一个厂里原有很多很多机构，一月革命后，统统垮了，只剩造反派掌权，那也蛮好的，什么都管。后来又成立革委会，就有了“两委”。要是成立党委，那就成了“三委”，再一整团，就有“四委”。（徐景贤：还有文攻武卫。）是呵，那就有了“五委”。还有什么？

.....

就一个革命委员会不是蛮好吗？将来好多机构，一开会，一开名单就是一大片。

.....可以不可以不要党委！我是主张杨（澈）开思想讨论的。

张春桥1969年6月15日在上海整党建党三个试点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设革命委员会，下边设几个人办理党务。

张春桥手稿

张春桥：工会可以发号施令嘛，党组织不执行是错误的。

1968年接见上海市部分工总司委员时的讲话

工代大会的命令，支部要执行，不执行是错误的，不通，可报上级党组织。

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接见上海市工会部分委员时的讲话

党的领导具体地通过党的主要成份工人阶级领导。

姚文元1969年6月6日在讨论《城市中小学教育纲要》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校谁来体现党的领导？其中主要一点是工人阶级派出自己的工宣队。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军队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红卫兵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等。

姚文元1969年6月6日在讨论《城市中小学教育纲要》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校党支部与革委会、工宣队、红卫兵团的关系)这些问题，扯一年也扯不清楚，……谁领导谁？要看谁比较正确，……谁正确，服从谁，……相互关系还是按此作标准。

张春桥1970年12月24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第三十九小组会上的讲话

（三）践踏党的章程，推行帮派组织路线

资本家可以入党。

张春桥的黑话。引自吉林省委组织部大批判组：《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1976年11月28日《吉林日报》

江青说：“有问题也可以入党”，“没有介绍（入党）也要批准”。

转引自《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1976年11月28日《吉林日报》

（选拔党员、干部的标准）“以活材料为主”，“档案只能作参考”，“社会关系复杂也不要紧，一切都要根据需要”，“叛徒有什么关系，就是真正的叛徒，只要江青相信就行了”。

王洪文1973年在上海市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在河南的亲信鼓吹“造反入党”、“反潮流做官”，大造反革命舆论。胡说“现在是新形势下新精神，党章不管用了”，“按接班人五条不行了”。

郑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李克基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

王洪文曾经讲：“组织大权我是无论如何不放的。”他还明目张胆地说：“林彪能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新干部。”

转引自《纺织工人愤怒清算大工贼王洪文滔天罪行》，1976年12月4日《解放日报》

江青曾得意洋洋地说：“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

转引自《结帮是为了篡党》，1977年3月17日《文汇报》

不怕人家说我们搞小集团。

江青1975年1月四届人大期间在北京前门饭店的一次讲话

一九七四年三月七日，江青对体委那个亲信说：“他们有他们的人马，你也要组织你的人马。”“核心小组要分化出几个，不能他方势力大，和老将谈谈，站到我们一边，能争取多少，争取多少，争取中立也好”。

转引自《批林批孔是假 结帮篡党是真》，1977年2月14日《体育报》

张春桥说，我们的整个党“不行了”，“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靠革命造反派，就交给我们了。”……“我的意见可以先发展党员，后恢复党组织。”

转引自《“四人帮”要“重建”一个什么党？》，1977年7月6日《文汇报》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说：“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敢干，有了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件就够了”，“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青的上来。年青干部在县委、公社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形成一股势力。”

转引自《是“开刀革命”还是篡权复辟？》，1977年2月7日《辽宁日报》

过去我们为什么日子总是很难过？就是没有权嘛，所以只好由他们头颈摸了过，因为你不团（注：指不是党员），最多只能管工代会。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我们这批阿卯（注：指少正卯，翁森鹤等人把自己比作少正卯），要在政治上翻身的好过，必须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否则全是空话。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再吃这个亏了，要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利用我们政治上占上风的时候，尽快地磨园（注：指突击入党）一批。

翁森鹤1974年8月底对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黄荫堂等人的谈话

周泉溪
（批林批孔初期）有一个张春桥的讲话我还有很深的印象，他讲：谁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我们造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我们看了这份讲话，心里象夏天吃棒冰，无限舒服。把他（的话）当作我们反潮流所要达到的标准。我们感激张春桥毕竟是我们造反派的“贴心人”。在浙江我们要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为“双突”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我们那时天天所想入非非的就是造反派如何坐天下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批林批孔中要解决的最高问题了。用这个讲话作为经典，我们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天

下，开会讲坐着天下，睡觉梦着坐天下，搞“双突”就是为了坐天下，而且我们仿效“四人帮”的样子，要成为浙江的为造反派讲话的全权代表，以笼络人心。

翁森鹤1976年11月7日的交代

（四）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江青1975年在大寨的讲话

江青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当有人把江青比做马克思时，江青带头鼓掌。

张天民同志的揭发。引自《材料之三》第166页

中央政治局通过电影《海霞》之后，江青狂叫什么“我要在场”我就大闹政治局，绝不会让他们通过”。

转引自北京电影制片厂《海霞》摄制组：《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铁证》，1977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张春桥叫嚣：“这里只能搞一言堂，就是按江青的意见办。”
“别人的话都不听，只听江青一个人的。”

转引自《彻底批判“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1977年6月22日《文汇报》

张春桥说：“我们在上海是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

转引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77年2月14日《北京日报》

张春桥蛮横地说：“对江青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转引自《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1977年3月10日《文汇报》

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张春桥1965年在《沙家浜》上演时对《文汇报》陈虞孙的谈话

王洪文说：“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张、姚）联系在一起的。”张春桥也得意地说：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话，他们就算数。”

转引自《新生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1977年6月4日《文汇报》

每个党员都必须对我和小谢的讲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不表态，就是党性不纯。

迟群1976年5月下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电话“指示”

王洪文说：“井冈山传统过时了，民主革命那一套吃不开了。”

原王洪文处工作人员肖木的揭发交代。引自《材料之三》
第11页

张春桥：整党整风是“老经验，形而上学，矛头向下”，“整党整风一百天也整不出马克思主义。”

转引自《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罪行》，1976年11月30日《北京日报》

强调纪律、集中就是资反路线。

张春桥的黑话。转引自焦裕：《“四人帮”是破坏学校革命秩序的罪魁祸首》，1977年8月13日《文汇报》

“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说：“民主只能是造反派的民主，集中只能集中造反派的意见。”

转引自《云南揭批“四人帮”运动向纵深发展》，1977年6月4日《人民日报》

五、推行反革命策略，阴谋篡党夺权

（一）玩弄反革命权术，施展政治欺骗

只要依靠群众，就是犯错误，我们是同群众一起干的。……群众也有份。

张春桥1968年8月21日在上海市革委会召集的公检法军管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过去走资派犯错误，就是因为同群众闹对立，你不懂这一点，就算不得造反派……。就是群众错了，也要站在一起。

张春桥1970年6月1日在接见上海工总司委员时的讲话

王洪文说：“什么叫党的一元化领导呢？就是要把各省第一书记套起来，让他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去整他。”

转引自《是“一元化”还是“一帮化”》，1977年1月24日
《人民日报》

（我看历史）看看去无非都是权术。现在实际上许多事也都是权术。我现在算是看透了。

当干部的人，一定要懂得权术。如果思想好，而不懂权术，那只能做雷锋、做王杰。

王知常1976年8月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青年的讲话

现在眼看快放暑假，各地学生所在单位都来信让赶快回去讲讲清华运动情况。（谢静宜插话：也有干部担心乱。）怕学生回去又把思想搞乱。我说这是好事，找都找不到，无非去受点教育，即使个别变了挽救不过来，也使我们党委受点教育。无非运动也是开门办学，无非比七八九（注：指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还七八九。运动搞了这么久，这点经验没总结出来不是白搞了吗？不要着急，一着急往往会在策略上犯错误，导致方向上犯错误。现在走资派很注意革命斗争上的策略，他刺激你一下，不要上当。

迟群1976年7月8日向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介绍清华黑经验时的讲话

现在运动就是搞大矛盾，矛盾搞大，通过斗争发展了，事情就解决了。……我们就是要制造大矛盾，要弄得大。

翁森鹤1974年2月18日在绍兴地区上访团召开的批林批孔报告会上的讲话

（二）鼓吹“矛头向上”，大闹党中央

你们刮游街风，斗斗周信芳之流，太小了，应当矛头向上。

张春桥1967年1月26日对上海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讲话

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内，在中央。

张春桥1976年2月底的一个黑批语

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覆。

张春桥1973年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对上海余党的谈话

眼睛盯住中央，瞪得大大的，把头上的角磨得尖尖的，把身上的刺长得硬硬的，要敢于放炮。

李伯秋1976年6月在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点盯住当权派。

• “在中央”下面的横线是张春桥加的。

首先看第一把手，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我们学校就要盯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

迟群1976年6月22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反党讲话。
引自《材料之三》第72页

“四人帮”那个亲信，胡说什么……“运动的阻力来自党内资产阶级，有台上的，就是走资派；有台下的，就是一般党员”。……“现在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司令斗争到底！”

转引自《愤怒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革命滔天罪行》，1976年12月2日《云南日报》

（三）煽动“全面内战”，分裂革命队伍

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广州讲话中）“解释”文化大革命性质时，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嘛，全面大内战”，用心险恶地胡说什么大乱“是绝对的”，鼓吹无时不乱，无事不乱。

转引自《反党野心家的自供状》，1976年12月13日《南方日报》

你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和平呀，那有什么意思呀！不利于阶级斗争，咱们不干。

张春桥1967年5月14日在南京地区群众组织大会上的讲话

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来解决。

张春桥1974年9月13日在总后汇报时的讲话。引自《材料之三》第26页

我今天是来放火的，反正闹就闹，武斗就武斗，几十万人武斗也可以，有人借此机会闹就闹。

张春桥1969年7月21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群众起来了，表面看很乱，甚至发生武斗，夺部队枪，就觉得形势不好了，看一看，这正表示群众发动起来了。

张春桥1968年1月31日在上海警备团干部战士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要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转引自《“四人帮”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1976年11月17日《广西日报》

江青：“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如果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

转引自《同仇敌忾，大揭大批“四人帮”》，1976年12月1日《云南日报》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就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战斗的

协议之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起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江青1967年7月22日对河南代表团的讲话

(武斗) “我带头指挥打过的”，“我亲自干过的”。

王洪文1975年7月28日在杭州第二棉纺厂的讲话

对枪，我是一个枪手。你不抢，那来的东西？

王洪文1969年8月19日在上海红艺织造厂的讲话

我看到有些抄家抄错，在门口贴上红纸，我一看就气。这是在给我们的红卫兵抹黑！抄错了，就不要说话。

.....

你们红卫兵要真正发挥作用，有的别人不好做的，我们不好说的，你们红卫兵就说嘛。我是不怕，因为我们有限制。

张春桥1967年8月12日在上海市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四) 妄图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全世界资产阶级把上海叫作左派的堡垒，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希望市委的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自毁长城，要巩固团结，巩固这个革命的堡垒。

张春桥1974年4月9日在朱永嘉4月9日信上的批语

上海一定要搞好，上海是以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张春桥1975年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对黄涛的谈话

我们要懂得把上海工作做好，对全国有重要意义，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把工作做好这是很重要的力量。

张春桥1970年6月1日同上海工总司头头的谈话

春桥这么长时间在上海，稍为动点脑筋就知道了，上海稳不住，对全国，对世界都有影响。

王洪文1968年4月12日上海出现揭露张春桥反动历史的大字报后在上海电视台的一次讲话

从肖木的谈话中，知道你们这一段压力不大，甚至没有感到多大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不注意阶级斗争，或者这方面的观念淡薄了，总要犯错误的。我这里说的是大局，不是个人的祸福（当然，个人同阶级的命运是分不开的）。也不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都需要研究，否则，你们将会失去战斗力。

.....

鲁迅所说他为什么要吃药、吃鱼肝油的那段话，始终鼓励着我。

张春桥1975年12月10日给朱永嘉、陈冀德的信*

-
-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四人帮”多次严肃批评，使“四人帮”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封信是张春桥向自己的亲信吹风，要他们增强反革命的“战斗力”。信中所引“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是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敌戒》中的话；所

(上海)市委内部的团结,要很好注意。去年七、八、九月那个时候,容易团结一致,现在外部的压力轻了,内部的团结可能出现问题。……现在这个时候,容易犯错误,不团结,不谨慎。要注意哟!

张春桥1976年2月23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

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

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

要看到曲折,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就是北京炸平,相信各地会出领袖;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领袖。林彪、△△△要搞上海没有搞成,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要打仗。^{附件}

张春桥1976年9月下旬的一次讲话

现在你们是工总司委员,过了几年,你们有的可能是市委书记、副书记,有的是中央部长、副部长。

张春桥1967年12月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要多选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本来我不大愿意从上海抽干

提鲁迅的话出自《坟·题记》,原文是:“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全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张春桥引用这些话,是为了发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刻骨仇恨。

部，多抽了又要说上海帮，现在感到有需要，就要抽！

张春桥1973年在十一届一中全会期间同祝家耀等人的一次谈话

“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各部”，“象张铁生那样，到部老爷那里去闹个天翻地覆，才能起到沙子的作用”。

张春桥1973年9月在“十大”以后对王秀珍等人的谈话

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青年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

王洪文1974年8月对王秀珍的谈话

上海要准备一百名干部，随时准备抽调出去。

王洪文1974年8月的一次讲话

最近辽宁（注：指毛远新）同我们通电话，提到要向中央各部送人，过去想不通，现在他们想通了，要把张铁生那样身上有刺的人送去。我们上海也要准备送，多选一点、物色一点真正路线觉悟高的、敢于反潮流的人。

王秀珍1976年2月7日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各小组负责人会上的讲话

今后写作组的人出去，可以结合慰问团的工作，到外地去做一

些社会调查。

姚文元1975年初四届人大开会期间在董里同朱永嘉的个别谈话

应当改变方针，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对革命派，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杀回去；对保守组织，应当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觉醒过来。一时弄不清的，加以调查。要组织一个班子，准备接待十万人。这是上海的义务。要旗帜鲜明，否则，有损上海革委会的威信。做好了，对全国造反派是很大的支持。

张春桥1967年7月31日在上海建议中央文革赞成各有关地区劝阻群众来沪问题的电报上的批语

你们不要怕乱，不要怕武斗，不要怕破坏，让他们去搞好了，让他们去乱好了，让乱透了再去治，才能收效。破坏了再建设嘛！

张春桥1967年9月关于武斗问题的讲话

张春桥说：“我们这么大个国家，乱一点有好处，乱显得我们有生气。”

转引自《打倒“闹而优则仕”》，1977年2月27日《解放军报》

中国近代史上詹大悲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大乱

-
- 据朱永嘉交代，这是姚文元要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到外地去为“四人帮”搞特务情报活动。

是大好事。

姚文元1974年1月14日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各组负责人汇报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说：一个地方越是乱极了，烂透了，问题解决得最好。如果没有乱够乱透，象锅里的肉没有烂透，最不好吃。

转引自《同仇敌忾，大揭大批“四人帮”》，1976年12月1日《云南日报》

（武斗）死了几个没啥关系，只要把权夺过来就可以了，一切为了权。

王洪文1967年3、4月间的谈话

要把权拿到自己手里。

姚文元1967年2月9日对上海市一级群众组织一些头头的讲话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那个黑干将，去年三月下旬，……就赤裸裸地亮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计划：“要通过……夺权。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现在老干部大部分是代表旧事物的”，……“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第三条，在建立新政权之后，再抓生产建设”。

转引自《篡党夺权的自供状》，197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乱透了的地方，才能真正锻炼左派，左派才能掌权。

迟群1976年8月24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全面夺权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寸权必夺”。我们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还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据的权力统统夺回来！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1967年2月6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手稿

老实说，从严格意义上说，一些方面、一些单位的权，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一月风暴中夺过来，有时夺过来又失掉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也就在这里。不然，还批林批孔、批复辟倒退干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多少次？

张春桥1974年2月27日给马天水的信

要在政治上把老干部打得晕头转向，乘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就动手把权夺过来。

翁森鹤的黑话。引自《材料之三》第100页

唐岐山狂叫“走资派是一层，反革命一大片”，“要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利用政治上占上风的时候，抢进一班人”。

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揭发。引自《材料之三》第81页

第一，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打得厂里的党员、群众晕头转向，乘他们没有醒过来前，发展一批党员；第二，搞得厂里的几个老干部工作不下去，都要离开杭丝联；第三，动手要快，不要等到上级察觉，我们已经搞好了，造成既成事实。夺权好比吃饺子，一碗饺子别人要吃，你只要吐上馋唾水，别人就不要吃了，都归你吃了。

翁森鹤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讲话。据该厂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1977年8月9日的揭发

争你高我低，你小我大，争来争去不肯休，结果把大好时机摔了，西瓜打破了，大家吃不成，现在人家要摸你头颈了。如果把老中青班子搞好了，现在日子就比较过好一点了。

翁森鹤1974年10月14日在浙江省工宣队员授奖大会上“宣讲国庆社论”时的讲话

现在人家班子齐了，席位满了，不能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次都赶下去。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好比进戏院子看戏一样，先要让人家开门，否则，你在外面大吵大闹都是空的。宁可先说几句好话，让人家愿意开门，只要开了门，那怕是条门缝也可以，先从门缝里挤进去一个，然后把门挤开点，就可以进去一批。进了门，有多的位子就占，没有多的位子就挤，看谁的劲头大。这就是说，要发扬钉子精神，能钻，会挤。

挤也好，钻也好，都要看火候，抢时机，好比打兰球一样，比赛开始，大家就拼命地抢球投兰，否则，哨子一吹，比赛停止，就不准抢了，再抢就是犯规，投兰无效。这就叫做发扬打兰球的作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些单位动手早，进班子的人就多。有的拖拖拉

拉，失去时机，就空忙一阵，结果竹兰子打水一场空。你们要裤子放下点，胆子放大点，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只要进了班子，不犯大的错误，位子就是稳的。

“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胡勇1976年2月在长沙汽电厂召集帮派成员策划夺湖南省委领导权的黑会上的讲话

“四人帮”破坏党的 文艺事业言论摘编

(内部材料，征求意见稿)

一九七八年七月

编 印 说 明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在文艺问题上，散布了大量反动谬论，全面篡改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彻底粉碎“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努力繁荣创作，使文艺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这是当前文艺战线一项艰巨而迫切的战斗任务，也是一场持久的硬仗。这本资料，是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提供一些批判的靶子，供各地批判选用。

本稿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印的材料汇集而成，并作了精简和个别补充。

本稿系征求意见稿，不当之处，请提出意见。如有重要补充，希注明原始出处。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七月

目 录

一、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 1、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伟大成就……………（1）
- 2、鼓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实行法西斯专政……………（4）
- 3、制造所谓“空白”论，“创业期”论，“新纪元”论，标榜自己是革命文艺的“创始人”……………（8）
- 4、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和篡改毛主席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批示……………（11）

二、篡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妄图使文艺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

- 1、提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宣扬反革命政治纲领……………（15）
- 2、借口写好“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英雄人物”，为“四人帮”树碑立传……………（20）
- 3、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诋毁群众文化活动……………（21）

三、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

- 1、鼓吹“一家作主”、“打棍子有理”，叫嚣“我花开后百花杀”…………… (23)
- 2、扼杀剧种，摧残革命文艺作品，反对题材和艺术品种、风格、流派的多样化…………… (26)
- 3、全盘否定一切中外文化遗产，反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32)
- 4、利用历史影射反党，大搞古为“帮”用、洋为“帮”用，崇洋媚外…………… (36)

四、鼓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文艺观

- 1、打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旗号，提出“三突出”、“三陪衬”等一整套创作模式…………… (40)
- 2、反对写真人真事，鼓吹“主题先行”，主张文艺可以离开生活，凭空捏造…………… (43)
- 3、借批判所谓“黑八论”，颠倒是非，制造混乱…………… (46)

一、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 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1、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 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伟大成就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引自《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解放军报》

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的继续和发展。

陈伯达黑话，引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引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文艺黑线专政”论）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黑话，引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全国戏曲团体一共三千多，专业话剧团九十多，文工团八十多，一共才一百七十多个。三千多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新文艺团体一个时期演出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专了我们工农兵的政。

江青对《南海长城》的创作和拍摄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他们不许普及样板戏，有坏作品批评不得，我们的话根本不听。

江青在人大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几个单位的谈话，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

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

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

有的阵地十七年内一天也没有占领过，不要讲十七年，就是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前也没有占领过。

张春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文艺组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十七年来，这一小撮钻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文艺“权威”相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他们以北京、上海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主要据点，把黑手插向全国各地，在文化领域中，向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大搞“和平演变”。他们狂热地吹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他们狂热地支持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党内反革命修正

主义集团政治需要服务……他们狂热地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僵尸魔鬼、少爷小姐，总之，一切剥削阶级的丑恶形象，搬上舞台，加以美化，……十七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干尽了坏事！

姚文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

要讲失败，无产阶级最大的失败是这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打了败仗，付了多少学费？！拍了那么多的毒草片，钱都是无产阶级拿出来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权都叫人家篡夺了还不算打败仗？！现在是从组织游击队开始重新干嘛！

张春桥接见《白毛女》影片摄制组时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

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引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要知道上海文艺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上海经营的文艺界，是从有上海以来就开始了，其中到了三十年代，全国文艺界中心就在上海，阶级斗争在上海很尖锐。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另一方面是一直统治文艺界至这次文化大革命，其中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帮人，他们老早就叛变了，……像演剧几队，都是国民党的，就是他们的手，把一批青年引到国民党中去。

张春桥在接见上海文艺界代表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在文艺战线上也有这样一股风。……替文艺黑线翻案。……有的艺术院校的人说：“现在舞台上的人都是过去学院的，将来还

是。我看不出过去学校有什么错。你把学生给我，五年后交货。”

这不是翻案是什么？

于会泳在文化组召集的音乐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从56——63年所拍摄的电影大部分是低级下流的东西，用来腐蚀青年人。从政治和生活上来腐蚀，政治上是影射，你们看了也是气愤的，将来我们选几部让大家看看，知道一下他们是放什么毒。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五个艺术团和两个制片厂的工宣队时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解放二十多年来，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

江青在政治局委员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元旦

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少，就是怀念过去的毒草多。

刘庆棠在审查“五·一”节目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四月

2、鼓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实行法西斯专政

“砸烂旧摊子，重新组建文艺队伍”，“在文艺领域里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辽宁那个死党（即毛远新）的黑话，引自《革命文艺队伍不容污蔑》，《辽宁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我们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

都被放到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

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

在全国（文艺界）有一个黑网。

姚文元对天津文艺界代表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思想文艺界的队伍真可怕啊，非常复杂，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别处都工农化了，文艺界还藏了一大批资产阶级。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第八组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

你们要那么多剧团干吗？我看要改造，要劳动，搞农业生产去！他们搞什么“挖掘遗产”？混帐！要由群众查清后去劳动改造，有血债的要关起来。这完全是△△搞的。……不要那么多剧团，样板戏以后靠小型的电影机下农村。县以下的剧团一律要清理队伍，好的保留，坏的改造，再坏的要按公安六条关起来。以后这些老家伙，根本不能演工农兵，要研究出路。要区别对待，青年是我们培养起来的，可以改造吧！这些都是△△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义制造舆论而搞起来的。（陈伯达插话：对，对，是为复辟制造舆论。）

江青接见原浙江省革委会△△△、△△△时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

协会还要不要，不要了嘛，都可以去劳动改造，去五七干校。

江青在人大大会堂河北厅接见几个艺术团体人员时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

江青谈到从劳动中调回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时说：“那些团上来了，戏多了，人也多了，就会把样板戏给淹没了。”

“反正我不管那些团，我只管几个样板团。”

“你们文化组的中心工作就是抓好几个样板团。”

刘庆棠交待材料之五十七，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

知识分子一分钟就可能有几种态度，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加强调查，不断分析，加深认识，提高嗅觉。

张春桥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文艺界要分析现状，阶级关系总会变化的。

我们不杀不毙（指巴金同志），还不是落实政策？

张春桥在上海市学习班文化电影小组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下旬

你们告诉△△（指上海一电影导演），要向无产阶级投降就干脆一点，我们又不是有求于他，是他有求于我们的问题，离了他，我们照样过得挺好，不相信就培养不出比他好的。

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电影，还不是打胜仗！……没有电影还好一点，有了电影尽放毒。

张春桥对《白毛女》摄制组同志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

要抓几个人，枪毙几个人才解恨。

镇反始终未触及到文教战线。应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

张春桥在上海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

（谈到有的老演员要求演出时）那他要干什么？就让他唱，唱了就抓起来，就发动群众斗，要闹事的就这么办。

张春桥在听取上海五七京训班情况汇报时的插话，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上海电影厂太多了。你们把八种人和老弱病残的去掉，留下的也不多。老弱的人我们可给他钱，我们养他，只要他们不捣乱就行。

闹事的大多是这些养老的人。有一批人，你判他刑不够，坐监牢也不够，劳动也不行，工农兵教育他们也教育不过来，这样的人不能放在文艺界，还是我们把他养起来，养是一个办法。还有个办法就是分配到工厂去管。这些人就算他总共有一万，上海有一百二万产业工人，一百二十个人管一个不行吗？总可以的吧。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第八组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

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对立是天然的。

张春桥在《海港》剧组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

现在的一批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怎么把它化掉？这个瘤是很强的。

张春桥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报刊负责人的讲话，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给出路，不是他原来是编剧，我们就还给他做编剧。去劳动，

也是出路，不枪毙，不杀他，也是给出路，否则不得了。

张春桥接见电影系统工、军、革负责人时的讲话，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

江青对迟群、谢静宜的谈话，一九七四年一月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我们现在这支革命中形成的新的革命文艺队伍，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抡起“整顿”的板斧，想一斧就砍掉我们这支队伍，然后建立起一支象十七年那样的修正主义文艺队伍……就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艺队伍。

江天《铁案如山，岂容翻案》，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解放后，我们党也曾怀着极大的革命热忱，培养过一批工农作者。……但以后，人所共知，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向他们招手了，修正主义谬论在熏染他们了，终于把这些人锁进了“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彼得堡”——作家协会。结果，几年下来，有的变修了，有的好一点，但也生上了霉斑。总之，要代表辛勤哺育自己的阶级说话，很难了。

任侠《走出“彼得堡”》，《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3、制造所谓“空白”论、“创业期”论、“新纪元”论，标榜自己是革命文艺的“创始人”

京剧革命是划时代的革命。……我们是世界上彻底的革命者。

江青在人大大会堂接见几个艺术团体人员时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

真正搞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是我们。

姚文元在京西宾馆审查舞剧《红色娘子军》时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是首创者。

陈伯达在广播学院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江青××为文艺革命开辟了广阔道路，这是一个文艺复兴。

陈伯达看交响乐伴奏京剧《红灯记》时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

张春桥：无产阶级从《国际歌》算起，不算长，真正成绩大，化工夫的，是这个十年。

江青：从总的讲，是从六三年开始。

张春桥：那就十多年，看成绩大（小），要从整个艺术历史过程来看。

“四人帮”在天桥剧场接见文艺界代表时的讲话，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无产阶级从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问题。自从一九六四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才解决了。

江青黑话，引自《革命文艺是党的事业，不是行帮的事业》，《红旗》一九七七年第四期

样板戏是我搞的。

江青在小新庄的讲话，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候没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我们有样板戏，不是八个，而是二十几个。还出了几十部小说，几十部诗

集嘛！

江青在大寨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江青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张春桥黑话，引自《“四人帮”是摧残革命文艺的刽子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

江青××领导的文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天辟地的文艺大革命。

徐景贤在传达江青的意见后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

江青××是第一次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浩亮在《解放军报》社谈《红灯记》“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

搞文艺革命一共进行三次。一次在延安，因艺术粗糙，内容也有些欠妥，站不住。一次是五八年大跃进，有革命热情，但艺术粗糙，领导权又掌握在修正主义分子手里，很快被人打倒。第三次是六四年，总结经验，在政治内容、艺术上都站得住。

刘庆棠看舞剧《白毛女》后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九日

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样板作品，有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有了自己的文艺队伍，这就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

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4、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和篡改毛主席 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批示

（关于电影《创业》）毛主席批示“此片无大错”，也不是没有错，还有中错、小错嘛！

江青是好心，其实只要把学两论改成群众自发学就行了。说中央送两论，就是为刘少奇、薄一波树碑立传，翻案。

张春桥同女儿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四月底

主席说：“不要求全责备”，可是我们的创作也不要粗制滥造。

王洪文对上海五·七京训班等部分人员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这部片子（指《创业》）是有缺点，张天民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可见还是有错误的，为什么不检查？……在一个影片上为什么把两个还活着的高级干部牵进去，不好嘛！……

张天民这个年青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那个叫什么夫的导演，跳来跳去，要查一下，背后有坏人支持，要追后台。

江青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

你（指张天民同志）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

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江青在大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九月

你告老娘一状，你不要以为通天就了不得了，就翘起尾巴了。他们是逼着主席表态批示的。我要重新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重新拍一部《创业》电影。

江青在大寨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九月

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只限于《创业》，不牵涉其他方面。

于会泳黑话，引自文化部专题材料之四

有些乌龟王八旦乘机跳出来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保留反击的权利。

刘庆棠在中国舞剧团党委会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时的讲话，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

有人说，现在什么也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成绩全部抹杀。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出的东西不少，……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比那时多，这个我有材料。

江青在大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九月

老戏搞了几百年才那么几出，我们搞了十年就出了这么多，还少吗？

浴亮黑话，引自文化部专题材料之四

有人攻击样板戏少，我们现在是十八个样板戏，过去的戏多，都是毒草。

于会泳黑话，引自文化部专题材料之四

文艺政策调整，无非是幅度上放宽。

姚文元对朱永嘉等人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对文艺作品的最低要求，我们搞样板戏不能只按这些标准来要求。

浩亮黑话，引自文化部专题材料之四

我们要求艺术质量是与毛主席提出的“不要求全责备”是一致的。……不要一弄就说不要全责备，甚至在粗制滥造的情况下，也说不要全责备，这不行。

于会泳在原文化部召开的八个剧组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五七年、五九年都是这样。

姚文元同张春桥、江青一起召集于会泳、王曼恬、浩亮、刘庆棠开会的谈话，一九七五年八月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八、九两个月调整文艺政策？目的是为了造谣污蔑，颠倒黑白，搞分裂，搞修正主义。

徐景贤黑话，引自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电影系统揭批“四人帮”的材料之七

今后还会出修正主义，而且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来吹捧你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批你们批错了，你们是中国的肖洛霍夫，给你们发勋章，也许会说，应该给你们授予功勋艺术家、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诱以官、禄、德”，象林彪搞的那样，给你们很高的名誉，很高的地位，很高的利益，希望有人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我们到底能不能经得住？……如果还有修正主义，能

不能识别？能不能抵制？

徐景贤在上海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

你（指张平化同志）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们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了呢。

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二、篡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妄图使文艺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

1、提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宣扬反 革命政治纲领

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江青黑话，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你们说一下，现在那几个样板团里演的那些戏，……很少有社会主义时期的内容，特别是一个也没有与走派作斗争的戏，这怎么行？！现在我就给你们这么个重要任务：你们赶快布置给四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决裂》、《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

这个事，我和春桥已经商量过了。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今年就拿出来上演，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别的戏放一放嘛！这是重点。……越早越好。

江青在钓鱼台十七楼对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

过去我说过，写地富反坏，一接触党的书记就少了。其实，坏事都在党内负责干部。应当写，还非得写好。

王洪文在钓鱼台对一个亲信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

……现在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是老干部。新干部会不会？当然也会。但现在不要作为重点，宣传上不要这样做。写作品要同当前斗争形势相联系，目前看是老的多。

肖木在《朝霞》编辑部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

……△△△非常残酷。“整顿”“全靠老家伙”，非常阴险。

浩亮关于改编《战船台》的一次讲话，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

这方面具体的题材很多。铁路方面就是个好题材。……我看郑州铁路局的斗争就可以写。上海的“风庆轮”这个题材很值得写。那是和走资派斗争的典型事例。

刻划走资派要把△△△他们的那种顽固性、欺骗性、危害性的特点写出来。

主要英雄人物可以写一个新干部被走资派搞复辟打下去的，但也要写一个支持新干部的老干部也受到压制、打击。

张春桥对于会泳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

走资派还在走，……老的一定还在走。

徐景贤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召开的工农兵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

写与走资派的斗争，是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要求我们在坐的同志领导大家——特别是创作人员，积极地投入当前的斗争。……过去，江青不是说过要开排炮吗？现在我们要开新的排炮。

于会泳在八个剧组负责人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只写一个公社卫生院，概括的广度不大，思想深度也不大。应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一个部，这就作用大了。

张春桥黑话，引自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文化部文艺情况简报

要写大走资派，老走资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走资派可以写高一些，因为斗争实际就是如此。

还要写四种人。即秘书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公安厅厅长。

刘庆棠对中国舞剧团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

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到中央。

走资派不光是△△△一个人，是有一层人：是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²⁷

走资派也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来，判刑，还可以枪毙他几个。

这阵对影片《反击》创作人员的讲话，引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现在的小说，写来写去总是第二把手，什么副书记、厂长之类是走资派，我就不服气，坏事还不都是第一把手干的。

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一九七六年五月八日

现在斗争很尖锐。风庆轮的斗争就是△△△想要打击上海市委，整上海工人阶级，……要放手触及中央的部，部后面有中央的人。……不能只反贪官，不反搞修正主义的皇帝。风庆轮要重点搞，不能只写崇洋迷外，要写高级的、翻案的走资派。

△△△在上影厂文学组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

²⁸军队没有走资派吗？确实有几个走资派在那摆着，都是大家伙。有什么特殊？既然有，因此在文艺上反映这种斗争也没有什么特殊。……不驳倒军队特殊论，我们这个创作就搞不起来。

陈亚丁在全军参加全国曲艺调演领队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一九七六年七月

我们就是要塑造这样的走资派：出身好，有功劳，表面上不贪污腐化，但政治上反动，这样才有典型意义，才深刻。写走资派吃吃喝喝，搞腐化之类，太一般化了，意思不大。

“四人帮”一个亲信的讲话，引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报》

《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政治上思想上路线的正确和艺术上的完美，二者统一，是赶走资产阶级老爷的保证。

这帮在一封信上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八月

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的节日》，要作为两个战役来打。

于会泳黑话，引自文化部专题材料之十

广度就是要写得高一点，概括面大一些。可以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也可以写一个省，一个部嘛！（在会下对一些人甚至狂妄的叫嚣：“可以写到副总理！”）写这类作品，一定会遇到阻力，你们不是十八个人嘛，要像《沙家浜》里十八棵青松一样，抗严寒，傲风雪，冲破阻力前进。

于会泳在原文化部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

走资派是最大的反革命。……眼睛要盯着国务院，一直盯到中央。你不上揪，就连你一块儿揪。

这帮黑话，引自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斗争方向明了，应该敢碰了。党内资产阶级掌权，怎么能行呢！

最大的障碍是在老爷那里，一类老爷（在）国家，二老爷

(在)省，三老爷(在)市，障碍就在这里，

毛远新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六月初。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政治局有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

张春桥黑话，引自一九七七年第三期《历史研究》《一桩异乎寻常的反党事件——评“四人帮”伪造党史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六年七月份……据摄制人称《反击》是“江青亲自抓的”，还透露“中央首长指示”：“这部影片具有很现实和特殊的意义，要求越快越好，这是斗争的需要，形势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是紧急的政治任务，只能拍好，不能拍坏。”

引自一九七七年第一期《中山大学学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我就喜欢认准了干到底的人。原来不是讲继续跟走资派斗下去，不怕上山打游击吗？现在更清楚了：按既定方针办，跟走资派斗下去。电影不反映这个反映什么？

迟群黑话，引自文化部有关“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罪行材料

原清华大学政治部领导人^{马洪}△△△说：“第二部电影(指《反击》下)要一直写到毛主席去世，对毛主席遗志是继承还是背叛。”创作组表示没有生活，^{迟群}△△△说：“过两周也许能够给你们讲一讲，现在还看不清楚。”

引自文化部有关“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罪行材料